



中国高 等 教 育 学 会 编

中国 教育 科 研 参 考

2020 年第 18 期
总第 (484) 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

2020 年 09 月 30 日

目 录

中外教育研究方法比较

——基于国内外九种教育研究期刊的实证分析.....陆根书 刘 萍 陈 晨 刘 琰 (02)

质化研究：超越小样本迈向更大研究意义之可能.....罗 云 张雯闻 (12)

教育研究过程中的失真性问题反思.....刘晓红 李醒东 (17)

学术履历对教育学者实证研究产出的影响研究

——基于 2015—2019 年核心作者的分析.....马银琦 姚 昊 (22)

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的实证转向与现实反思

——基于 2010—2019 年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分析.....蒋贵友 (28)

编者的话：教育是与实践结合最紧密、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业。我国举办着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组织的复杂化、结构的多样化、水平的差异化以及人民群众教育诉求的个性化都在不断增强。回溯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其每一次重大突破，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发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提高教育科研水平就必须掌握合适的实证研究方法。目前学界将定量研究、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列为实证研究的三种主要形式，强调教育实证研究是基于证据解答教育问题的一种研究范式。实证研究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创新的方法链条，实验研究、准实验研究、大数据分析的方法体系都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本刊以“实证研究方法”为选题，集中选编若干文章，供读者参阅。

主编：王小梅

本期执行主编：王者鹤

责任编辑：王俊杰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5 号世宁大厦二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

邮编：100191

电话：(010) 82289239

电子信箱：gaoyanbianjibu@163.com

网址：www.cahe.edu.cn（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动态栏目）

中外教育研究方法比较

——基于国内外九种教育研究期刊的实证分析

陆根书 刘萍 陈晨 刘琰

一、引言

教育研究领域的专业杂志是专业共同体交流思想、激发讨论、分享信息的平台。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对教育领域的专业杂志所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过实证分析，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涉及作者及其单位、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研究层次、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代表人物和学术团体的思想、研究方法等。但就整体而言，对高等教育领域学术文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特征的讨论仍然比较缺乏，对中外主要高等教育研究杂志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的研究尤显匮乏。只有一小部分文献对此进行过讨论。例如，Hutchinson和Lovell在2004年对三本高等教育研究杂志（即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和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在1996-2000年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设计及方法论特征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发现，虽然这三本杂志之间存在一些差别，但这三本杂志中的大多数研究都是采用第一手或者第二手的调查数据进行的定量研究，这些定量研究大多采用中级或高级统计学课程所教授的程序和方法。

在强调创新的今天，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对研究方法的需求日渐急迫。虽然一些高校提供的高等教育专业训练课程中包含了研究方法的内容，也有很多关于研究方法的文献可资利用，但有关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文献仍显不足。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分析国内外9种教育研究杂志在2013—2015年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中外教育研究杂志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差异，并进一步讨论研究发现对发展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启示。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了分析中外教育研究杂志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特征，比较中外教育研究方法的差异，本研究选取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

国外的4种期刊和国内的5种期刊作为分析样本。国外4种期刊分别是：Springer出版的Higher Education（简称HE）和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简称RHE），John Wiley&Sons Ltd出版的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简称HEQ）、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简称JHE）。国内五种期刊分别是《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些期刊，是因为它们在国外和国内高等教育领域中具有较高的声誉。

在确定这些期刊之后，我们以这9种期刊在2013—2015年间发表的所有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对这些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整理。剔除了编者的话、书评、序作、硕士和博士论文提要、通知声明、征稿启事、高校与院系介绍、讲话稿、会议纪要与综述等文章后，国外4个期刊共得到有效文献573篇，国内5个期刊获得有效文献2327篇，本研究以这2900篇学术论文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表1列出了中外期刊在2013—2015年间刊发的学术论文数量情况。

（二）研究方法的分类

有关研究方法的分类，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并

表1 9种期刊在2013—2015年间刊发的学术论文数量

期刊	频数	百分比
国外		
HE	314	10.83
HEQ	62	2.14
JHE	89	3.07
RHE	108	3.72
国内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145	5.00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300	10.35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554	19.10
《高等教育研究》	553	19.07
《教育研究》	775	26.72
总计	2900	100.00

不完全相同。例如, Lopez-Fernandez等人将研究分为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又分为质性研究、定量研究和混合研究等类别。徐辉等人认为, 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结合研究三类。高耀明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分为思辨研究、质性研究、定量研究3类, 同时又将每类研究方法细分为4种研究方法。王微根据研究性质是思辨性的或经验性的, 研究取向是描述性的或规范性的, 研究对象是一般的或特定的现象, 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分为综述研究、理论研究、哲学研究、实践研究、定量研究、质的研究6类。Pring认为, 教育研究方法包括观察、实验、调查、访谈、个案研究、历史研究、文献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行动研究等类别。Tight将教育研究方法分为文献分析、比较分析、访谈、调查和多变

量分析、概念分析、现象学法、批判/女权主义的视角、自传/传记研究和观察研究等8类。

在参考国内外学者对研究方法分类的基础上, 本研究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分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类, 实证研究又包括质性研究、定量研究和混合研究三个类别, 在这些类别下又可以细分不同的研究方法。表2列出了本研究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具体分类。

实证研究是研究者亲自搜集各种资料, 为提出理论假设或者检验理论假设而开展的研究。因此, 开展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 就是资料、数据的搜集。本研究将各学术论文中资料、数据的搜集方法分为如下几类(详见表3)。

(三) 数据分析方法

为了分析国内外9个教育研究类期刊所采用的

表2 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

思辨研究	通过言辞辩论对事物性质进行探讨,包括文献综述、概念分析、理论研究等		
实证研究	质性研究	案例研究	以特定的事件为观察对象并提出参考性或咨询性意见的研究
		叙事研究	通过故事叙述的形式来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世界
		历史研究	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历史事实进行逻辑分析,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寻找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行动研究	研究重点不在于描述事实,而在于制定行动方案,改善行动
		民族志研究	强调实地考察、进行田野研究,解释研究对象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和生活方式
		文本分析	以搜集到的文本资料为对象,对其进行比较、分析、综合,从而提炼出更深刻、全面的见解
		话语分析	对话语的有关维度进行综合性的描述,包括语言使用、信念传递、社会情境中的互动等,也包括批判性话语分析
		其他质性研究	不属于上述7类的其他质性研究
	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包括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生存函数分析等方法的研究,也包括采用分层线性模型(HLM)、数据包络分析(DEA)、社会网络分析等高级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	
混合研究	既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又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研究		

表3 实证研究搜集资料与数据的方法

类型	说明
调查	各种形式的问卷、量表调查,包括网络调查、邮件调查、电话调查等
访谈	包括电话访谈、面对面访谈,焦点小组、座谈会、面对面的讨论和谈话等也归入访谈之中
观察	包括参与式观察和非参与式观察
考试测验	主要作为学生成绩的数据来源
视听资料	包括视频、音频、照片、图片等
文本资料	包括政策文本、各种报告、会议记录、演讲文件、出版物、报纸、信件、日记、合同、档案等资料
网站资料	从学校等机构或组织的网站上搜集资料
期刊数据库	数据来自各种期刊或数据库,如 Higher Education 等学术期刊、知网、谷歌学术、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
二手统计资料	政府、学校、国际性组织等机构的统计资料,包括人口普查数据、其他全国性的大型调查数据等

研究方法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本研究首先应用SPSS统计软件对国内外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其次，对国内外及不同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的分布状态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并作 χ^2 检验，以分析、比较各类研究方法的分布特征、差异程度及其发展趋势；第三，对国内外期刊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所采用的定量与质性研究具体方法，以及搜集数据资料的方法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和 χ^2 检验，以比较国内外期刊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与搜集数据资料方法的差异。

三、研究结果

(一) 中外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及其变化趋势比较

表4比较了中外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及其变化趋势。

从表4可见，在国外期刊发表的573篇学术论文中，有66篇为思辨性/观点性的论文，占11.5%，有507篇为实证研究论文，占88.5%；在实证研究论文中，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有184篇，占32.1%，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有258篇，占45.0%，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的有65篇，占11.4%。在国内期刊发表的2327篇论文中，有1348篇为思辨性/观点性的论文，占57.9%，有979篇为实证研究论文，占42.1%；在实证研究论文中，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有503篇，占21.6%，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有418

篇，占18.0%，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的有58篇，占2.5%。Pearson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国内外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存在显著差异($\chi^2=453.886$, $P=0.000$)。国外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主要以实证研究论文为主，在实证研究论文中，以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为主；国内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则主要以思辨研究为主，在实证研究论文中，以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为主。

表4还分析了中外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在2013—2015年间的变化情况。Pearson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在2013—2015年间，国外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没有发生显著变化($\chi^2=6.195$, $P=0.402$)；在2013—2015年间，国内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则发生了显著变化($\chi^2=14.500$, $P=0.025$)，从表4可见，思辨研究有在波动中下降的趋势，实证研究有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在实证研究中，质性研究逐渐减少，定量研究和混合研究逐渐增多。

(二) 国外4种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及其变化趋势比较

表5比较了国外4种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及其变化趋势。Pearson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国外4种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存在显著

表4 中外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及其变化趋势

国别	三年合计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国外								
思辨研究	66	11.5	19	10.8	27	14.0	20	9.8
实证研究	507	88.5	157	89.2	166	76.0	184	90.2
质性研究	184	32.1	63	35.8	57	29.5	64	31.4
定量研究	258	45.0	75	42.6	82	42.5	101	49.5
混合研究	65	11.4	19	10.8	27	14.0	19	9.3
合计	573	100.0	176	100.0	193	100.0	204	100.0
国内								
思辨研究	1348	57.9	464	59.0	440	57.2	444	57.5
实证研究	979	42.1	322	41.0	329	42.8	328	42.5
质性研究	503	21.6	189	24.0	168	21.8	146	18.9
定量研究	418	18.0	120	15.3	140	18.2	158	20.5
混合研究	58	2.5	13	1.7	21	2.7	24	3.1
合计	2327	100.0	786	100.0	769	100.0	772	100.0

差异 ($\chi^2=115.497$, $P=0.000$)。其中, HEQ发表的论文采用思辨研究方法的比例最高, 达27.4%, 其后依次是HE、JHE和RHE, 分别为14.0%、4.5%和0.9%。这4种国外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也存在区别: 在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中, HEQ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比例最高, 达40.3%, 其后依次是HE、JHE和RHE, 分别为39.8%、34.8%和2.8%; RHE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比例最高, 达93.5%, 其后依次是JHE、HE和HEQ, 分别为51.7%、31.2%和21.0%。4种期刊也都发表过部分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的论文, 其比例介于2.8%—15.0%。

表5还分析了国外4种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在2013—2015年间

的变化情况。Pearson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 在2013—2015年间:

HEQ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发生了显著变化 ($\chi^2=13.007$, $P=0.043$)。就总的变化趋势而言, HEQ发表的论文中, 采用思辨研究方法的比例逐年下降, 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比例逐年上升, 在实证研究中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则存在一定的波动。

HE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则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chi^2=6.069$, $P=0.415$)。HE发表的论文中, 采用思辨和实证研究方法的比例变化不大, 在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中, 应用定量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有小幅上升。

表5 国外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及其变化趋势

国外期刊名称	三年合计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HEQ								
思辨研究	17	27.4	8	38.1	5	23.8	4	20.0
实证研究	45	72.6	13	61.9	16	76.2	16	80.0
质性研究	25	40.3	5	23.8	12	57.1	8	40.0
定量研究	13	21.0	6	28.6	0	0.0	7	35.0
混合研究	7	11.3	2	9.5	4	19.0	1	5.0
合计	62	100.0	21	100.0	21	100.0	20	100.0
HE								
思辨研究	44	14.0	10	11.2	18	16.7	16	13.7
实证研究	270	86.0	79	88.8	90	83.3	101	86.3
质性研究	125	39.8	42	47.2	39	36.1	44	37.6
定量研究	98	31.2	23	25.8	32	29.6	43	36.8
混合研究	47	15.0	14	15.7	19	17.6	14	12.0
合计	314	100.0	89	100.0	108	100.0	117	100.0
JHE								
思辨研究	4	4.5	0	0.0	4	13.3	0	0.0
实证研究	85	95.5	29	100.0	26	86.7	30	100.0
质性研究	31	34.8	15	51.7	6	20.0	10	33.3
定量研究	46	51.7	13	44.8	16	53.3	17	56.7
混合研究	8	9.0	1	3.4	4	13.3	3	10.0
合计	89	100.0	29	100.0	30	100.0	30	100.0
RHE								
思辨研究	1	0.9	1	2.7	0	0.0	0	0.0
实证研究	107	99.1	36	97.3	34	100.0	37	100.0
质性研究	3	2.8	1	2.7	0	0.0	2	5.4
定量研究	101	93.5	33	89.2	34	100.0	34	91.9
混合研究	3	2.8	2	5.4	0	0.0	1	2.7
合计	108	100.0	37	100.0	34	100.0	37	100.0

JHE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chi^2=14.235$, $P=0.027$)。就总的变化趋势而言, JHE发表的论文中, 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表现出了一定的波动性。

RHE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chi^2=5.886$, $P=0.436$)。就

总的变化趋势而言, RHE发表的论文主要是实证研究类成果, 而且以定量研究为主。

(三) 国内5种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及其变化趋势比较

表6比较了国内5种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及其变化趋势。

表6 国内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及其变化趋势

国内期刊名称	三年合计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高等教育研究》								
思辨研究	370	66.9	114	63.0	122	66.3	134	71.3
实证研究	183	33.1	67	37.0	62	33.7	54	28.7
质性研究	97	17.5	39	21.5	31	16.8	27	14.4
定量研究	73	13.2	25	13.8	27	14.7	21	11.2
混合研究	13	2.4	3	1.7	4	2.2	6	3.2
合计	553	100.0	181	100.0	184	100.0	188	100.0
《教育研究》								
思辨研究	501	64.6	181	66.5	167	64.2	153	63.0
实证研究	274	35.4	91	33.5	93	35.8	90	37.0
质性研究	131	16.9	46	16.9	53	20.4	32	13.2
定量研究	131	16.9	42	15.4	37	14.2	52	21.4
混合研究	12	1.5	3	1.1	3	1.2	6	2.5
合计	775	100.0	272	100.0	260	100.0	243	100.0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思辨研究	291	52.5	88	50.3	90	49.2	113	57.7
实证研究	263	47.5	87	49.7	93	50.8	83	42.3
质性研究	139	25.1	58	33.1	43	23.5	38	19.4
定量研究	106	19.1	24	13.7	44	24.0	38	19.4
混合研究	18	3.2	5	2.9	6	3.3	7	3.6
合计	554	100.0	175	100.0	183	100.0	196	100.0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思辨研究	130	43.3	57	52.8	42	45.2	31	31.3
实证研究	170	56.7	51	47.2	51	54.8	68	68.7
质性研究	92	30.7	32	29.6	24	25.8	36	36.4
定量研究	64	21.3	18	16.7	19	20.4	27	27.3
混合研究	14	4.7	1	0.9	8	8.6	5	5.1
合计	300	100.0	108	100.0	93	100.0	99	100.0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思辨研究	56	38.6	24	48.0	19	38.8	13	28.3
实证研究	89	61.4	26	52.0	30	61.2	33	71.7
质性研究	44	30.3	14	28.0	17	34.7	13	28.3
定量研究	44	30.3	11	22.0	13	26.5	20	43.5
混合研究	1	0.7	1	2.0	0	0.0	0	0.0
合计	145	100.0	50	100.0	49	100.0	46	100.0

Pearson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国内5种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存在显著差异 ($\chi^2=102.501$, $P=0.000$)。其中，《高等教育研究》发表的论文采用思辨研究方法的比例最高，达66.9%，其后依次是《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和《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分别为64.6%、52.5%、43.3%和38.6%。

这5种国内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也存在区别：在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中，《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最高，达30.7%，其后依次是《北京大学教育评论》《高等工程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和《教育研究》，占比分别为30.3%、25.1%、17.5%和16.9%；《北京大学教育评论》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最高，达30.3%，其后依次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研究》，占比分别为21.3%、19.1%、16.9%和13.2%。5种期刊都发表过部分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的论文，但都没有超过5.0%的比例。

表6还分析了国内5种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在2013—2015年间的变化情况。Pearson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在2013—2015年间：

《高等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chi^2=5.653$, $P=0.463$)。在《高等教育研究》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主要以采用思辨研究方法，近三年发表的这类文章所占的比例还有小幅上升。

《教育研究》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也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chi^2=10.432$, $P=0.108$)。在《教育研究》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也主要采用思辨研究方法。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发生了显著变化 ($\chi^2=13.931$, $P=0.030$)。就总的变化趋势而言，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采用思辨研究方法的比例有所上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比例有所下降，就实证研究中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而言，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论文所占比例有所下降，采用定量研究的论文所占比例有所上升。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发生了显著变化 ($\chi^2=16.529$, $P=0.011$)。就总的变化趋势而言，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采用思辨研究方法的比例逐年下降，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比例逐年上升；在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中，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比例有所上升。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chi^2=8.776$, $P=0.187$)。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且近三年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发表的论文数所占比例有所上升。

(四) 中外期刊发表的质性研究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

表7比较了国内外期刊发表的质性研究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从中可见：

表7 国内外期刊发表的质性研究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

类型		国外期刊	国内期刊
案例研究	篇数	84	196
	%	45.7	39.0
历史研究	篇数	5	117
	%	2.7	23.3
文本分析	篇数	77	70
	%	41.8	13.9
行动研究	篇数	0	61
	%	0	12.1
叙事研究	篇数	4	43
	%	2.2	8.5
民族志	篇数	4	10
	%	2.2	2.0
话语分析	篇数	9	6
	%	4.9	1.2
其他	篇数	1	0
	%	0.5	0
合计	篇数	184	503
	%	100.0	100.0

在国外期刊发表的184篇质性研究论文中（不包括混合研究论文中所使用的质性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比例最高，占45.7%；其次比例较高的是文本分析，占41.8%；应用话语分析方法（占4.9%）、历史研究方法（占2.7%）、叙事研究方法（占2.2%）、民族志方法（2.2%）和其他质性方法（0.5%）较少。 χ^2 检验的结果表明，国外4种期刊采用案例研究、叙事研究和话语分析方法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国外4种期刊发表的质性研究论文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因篇幅关系未列出）。

在国内503篇质性研究论文中（不包括混合研究论文中所使用的质性研究方法），案例研究的比例最高，占39.0%；应用历史研究方法（占23.3%）、文本分析方法（占13.9%）和行动研究方法（占12.1%）也较多；应用叙事研究方法（占8.5%）、民族志方法（2.0%）与话语分析方法（1.2%）则较少。 χ^2 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国内5种期刊采用案例研究、历史研究、文本分析、行动研究、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国内5种期刊发表的质性研究论文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因篇幅关系未列出）。

（五）中外期刊发表的定量研究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

表8比较了国内外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从中可见：

国外258篇定量研究论文中（不包括混合研究论文中所使用的定量研究方法），描述性统计方法使用的比例最高，达97.3%；使用回归分析方法的比例也较高，达67.4%；信效度检验、相关分析、T

检验、因子分析、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6种定量研究方法应用比例也都高于10%；结构方程模型、分层线性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3种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比例都在5%及以上；社会网络分析、聚类分析、路径分析、事件史分析、判别分析、生存函数分析等12种定量分析方法的比例都在4.5%以下。 χ^2 检验结果表明，国外4种期刊的学术论文在使用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路径分析4种定量研究方法上存在显著差异（国外4种期刊发表的定量研究论文所采用的具体定量方法因篇幅关系未列出）。

国内418篇定量研究论文中（不包括混合研究论文中所使用的定量研究方法），描述性统计方法使用比例最高，达93.3%；回归分析方法的应用比例也较高，达36.8%；信度分析、相关分析、T检验、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应用比例也都高于10%；非参数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也有所应用，比例都达到了6.5%；社会网络分析、聚类分析、分层线性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

表8 国内外期刊发表的定量研究论文所采用的定量研究方法比较

类型	频数与比例	国外期刊	国内期刊	类型	频数与比例	国外期刊	国内期刊
描述性统计	篇数 %	251 97.3	390 93.3	结构方程模型	篇数 %	21 8.1	27 6.5
T检验	篇数 %	29 11.2	74 17.7	社会网络分析	篇数 %	5 1.9	10 2.4
相关分析	篇数 %	65 25.2	83 19.9	分层线性模型	篇数 %	24 9.3	8 1.9
信度分析	篇数 %	51 19.8	89 21.3	数据包络分析	篇数 %	0 0	4 1.0
因子分析	篇数 %	42 16.3	57 13.6	倾向得分匹配法	篇数 %	13 5.0	8 1.9
方差分析	篇数 %	28 10.9	54 12.9	事件史分析	篇数 %	6 2.3	0 0
协方差分析	篇数 %	3 1.2	1 0.2	生存函数分析	篇数 %	6 2.3	0 0
非参数检验	篇数 %	27 10.5	27 6.5	时间序列分析	篇数 %	0 0	3 0.7
回归分析	篇数 %	174 67.4	154 36.8	多重归因	篇数 %	11 4.3	1 0.2
聚类分析	篇数 %	5 1.9	9 2.2	多维尺度分析	篇数 %	1 0.4	1 0.2
判别分析	篇数 %	1 0.4	3 0.7	潜在类别分析	篇数 %	3 1.2	1 0.2
路径分析	篇数 %	8 3.1	6 1.4	粗粒度精确匹配	篇数 %	2 0.8	/ /
				合计	篇数 %	258 298.4 ^a	418 241.5 ^a

注：a因一篇论文中可能会采用多种定量分析方法，所以累计百分比超过100。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国外期刊一篇定量研究论文平均使用2.98种定量分析方法，国内期刊一篇定量研究论文平均使用2.42种定量分析方法。

的比例都在3%以下。 χ^2 检验结果表明,国内5种期刊的学术论文在使用回归分析、相关分析、方差分析、路径分析4种定量研究方法上存在显著差异(国内5种期刊发表的定量研究论文所采用的具体定量方法因篇幅关系未列出)。

(六) 中外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搜集资料和数据方法比较

表9比较了中外教育研究期刊中发表的实证研究类学术论文搜集数据资料方法的差异。在国内期刊发表的979篇实证研究类论文中,有959篇明确了数据资料的搜集方法,有20篇没有明确说明数据资料的搜集方法;在国外期刊发表的507篇实证研究类论文中,有506篇明确了数据资料的搜集方法,有1篇没有明确说明数据资料的搜集方法。Pearson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外教育研究期刊中发表的实证研究类学术论文搜集数据资料的方式存在显著差异($\chi^2=288.964$, $P=0.000$)。

从表9可见,在国外4种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506篇实证研究类论文中,有353篇论文采用一种数据资料搜集方法,占69.8%,有153篇论文采用了两种或以上的数据资料搜集方法,占30.2%;在单独采用的数据资料搜集方法中,利用二手统计资料的比例最高,达32.0%,其后依次是问卷调查(14.2%)、访谈(12.1%)、文本资料(9.3%)、期刊数据库(2.0%)和观察(0.2%),作者没有单独使用网站、视听和考试测验等数据资料。

从表9可见,在国内5种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959篇实证研究类论文中,有757篇论文采用一种数据资料搜集方法,占78.9%,有202篇论文采用了两

种或以上的数据资料搜集方法,占21.1%;在单独采用的数据资料搜集方法中,利用文本资料的比例最高,达30.4%,其后依次是问卷调查(20.8%)、二手统计资料(9.3%)、网站资料(6.8%)、观察(4.7%)、期刊数据库(3.9%)、访谈(2.9%)、考试测验(0.2%),作者没有单独使用视听资料。

表9进行的 χ^2 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中外期刊在使用问卷调查、访谈、观察、文本资料、网站资料、二手统计资料等数据资料搜集方法时,存在显著差异。

表10分析了中外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不同类型的实证研究论文采用的搜集数据资料方法的差异情况。Pearson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国外期刊,还是国内期刊,它们发表的不同类型的实证研究论文所采用的搜集数据资料的方法都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国外期刊发表的质性研究论文中,主要采用访谈、文本或两种及以上方法搜集资料;定量研究论文中,则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二手统计资料或两种及以上方法搜集资料;混合研究论文中,则主要采用两种及以上方法搜集资料。在国内期刊发表的质性研究论文中,主要采用文本或两种及以上方法搜集资料;定量研究论文中,则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二手统计资料或两种及以上方法搜集资料;混合研究论文中,则主要采用两种及以上方法搜集资料。

四、结论与建议

(一) 主要结论

1. 从总体上看,国内外教育研究的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国外教育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思辨研

表9 中外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搜集数据资料方法比较

资料和数据搜集方法	国外期刊		国内期刊		χ^2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问卷调查	72	14.2	199	20.8	4.629*
访谈	61	12.1	28	2.9	61.840***
观察	1	0.2	45	4.7	19.483***
考试测验	0	0.0	2	0.2	0.937
文本资料	47	9.3	292	30.4	72.797***
网站资料	0	0.0	65	6.8	32.285***
二手统计资料	162	32.0	89	9.3	159.495***
期刊数据库	10	2.0	37	3.9	2.533
视听资料	0	0.0	0	0.0	/
采用以上方法中两种或以上	153	30.2	202	21.1	/
合计	506	100.0	959	100.0	

注: * $P<0.05$; *** $P<0.001$ 。

究为辅；国内教育研究仍然以思辨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为辅。从2013—2015年间的发展趋势看，国外教育研究方法类型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国内教育研究方法类型则发生了显著变化：思辨研究所占比例在波动中有所下降，实证研究所占比例在波动中有所上升；在实证研究中，质性研究趋于下降，定量研究、混合研究趋于上升。

2. 国内外不同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教育研究方法类型及其发展趋势存在显著差异。国内外9种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思辨研究、质性研究、定量研究和混合研究的比重各有不同，表现出了不同的教育研究方法的倾向性。在2013—2015年间，国内外有的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类型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国外的HEQ、JHE，国内的《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有的则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例如，国外的HE、RHE，国内的《高等教育研究》

《教育研究》和《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3. 国内外期刊发表的质性研究论文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就整体而言，国外期刊发表的质性研究论文采用案例研究、文本分析方法的比例较高，分别占45.7%和41.8%，采用其他质性研究方法的则都不足5.0%；国内期刊发表的质性研究论文采用案例研究、历史研究、文本分析和行动研究的比例较高，分别达39.0%、23.3%、13.9%和12.1%，采用叙事研究方法的也达8.5%，采用其他质性研究方法的则不足5.0%。

不同期刊发表的质性研究论文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也存在一定程度差异。例如，国外4种期刊发表的质性研究论文所采用的案例研究、叙事研究和话语分析方法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国内5种期刊发表的质性研究论文所采用的案例研究、历史研究、文本分析、行动研究、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

表10 中外教育研究期刊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搜集数据资料方法比较

数据资料搜集方法	频数与百分比	国外期刊			国内期刊		
		质性研究	定量研究	混合研究	质性研究	定量研究	混合研究
问卷调查	频数	4	63	5	4	188	7
	%	2.2	24.4	7.7	0.8	45.1	12.1
访谈	频数	61	0	0	23	2	3
	%	33.3	0.0	0.0	4.8	0.5	5.2
观察	频数	0	1	0	45	0	0
	%	0.0	0.4	0.0	9.3	0.0	0.0
考试测验	频数	0	0	0	1	1	0
	%	0.0	0.0	0.0	0.2	0.2	0.0
文本资料	频数	40	6	1	285	7	0
	%	21.9	2.3	1.5	58.9	1.7	0.0
网站资料	频数	0	0	0	55	9	1
	%	0.0	0.0	0.0	11.4	2.2	1.7
二手统计资料	频数	10	146	6	8	78	3
	%	5.5	56.6	9.2	1.7	18.7	5.2
期刊数据库	频数	0	8	2	2	35	0
	%	0.0	3.1	3.1	0.4	8.4	0.0
两种或以上方法	频数	68	34	51	61	97	44
	%	37.2	13.2	78.5	12.6	23.3	75.9
合计	频数	183	258	65	484	417	58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4. 国内外期刊发表的定量研究论文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国内外期刊发表的定量研究论文中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回归分析、相关分析、信度和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等常用统计方法的比例都较高，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分层线性模型等高级统计方法的比例比较低。

但国内外期刊发表的定量研究论文所采用的具体定量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例如，国外4种期刊发表的定量研究论文在使用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路径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上存在显著差异；国内5种期刊发表的定量研究论文在使用回归分析、相关分析、方差分析、路径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上存在显著差异。

5. 国内外期刊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所采用的数据资料搜集方法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国内外期刊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在采用问卷调查、访谈、观察、文本资料、网站资料、二手统计资料等数据资料搜集方法时，存在显著差异。国内外期刊发表的质性、定量和混合等不同类型的实证研究论文所采用的数据资料搜集方法存在着显著差异。

（二）建议

1. 应该积极推进教育实证研究。近年来，我国的教育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比例有所上升，但总体提升不多。长期以来，思辨研究占主导地位，对我国教育研究发展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思辨研究缺乏系统的数据资料收集过程，主要依靠逻辑工具进行思考和辩论，规范性不强。实证研究则强调通过对教育现象进行实证的观察和分析来把握教育现象的数量关系或本质

特征，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深入分析，规范性较强。积极推进实证研究的发展，有助于提升我国教育研究的规范化水平。

2. 积极发展不同类型的实证研究，以保持实证研究类型的多样化。近年来，在我国的实证教育研究中，质性研究的比例有所下降，定量研究的比例有所上升，就总体而言，两者所占比例比较接近，约占20%左右；混合研究所占的比例较低，仅占2.5%，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具体的质性研究方法中，文本分析、民族志、话语分析等方法有待加强；在定量研究方法中，除采用描述统计、T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信度分析、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等常规统计分析方法外，也应加强结构方程模型、分层线性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数据包络分析等高级统计方法的应用。

3. 积极促进实证研究数据资料搜集方法的多元化发展。目前，我国的实证教育研究就其采用的数据资料搜集方法而言，主要采用的是文本资料、问卷调查、二手统计资料等，其他类型的数据资料搜集方法利用较少，相对比较单一。因此，在积极推进实证研究发展的同时，也需要鼓励实证研究数据资料搜集方法的多元化发展。

（陆根书，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 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教授，陕西西安 710049；刘萍，西安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049；陈晨，西安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049；刘琰，西安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049）

（原文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16年第10期）

质化研究：超越小样本迈向更大研究意义之可能

罗 云 张雯闻

连续多年，本研究第一作者一直给研究生开设《质化研究方法》课程。每年课堂上，同学们困惑最多的问题是质化研究都是小样本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怎么能得出有普遍性的结论？如果得不出有普遍性的结论，研究的意义在哪？而每年在学生毕业论文评审、答辩时，笔者却又经常看到，不少同学都明确声称研究采用质化方法，而行文中或者仅是对有限样本的描述，或者是仅拿个案当宏大论述的注脚，但最后通常会雄心勃勃地给出普遍性结论或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建议，其中问题显而易见。

学生课堂里的困惑，其实也是质化研究最常为学界其他方法立场学者所质疑的问题，而学生实际研究中宣称用质化方法做出来的研究的样子，则大抵是质化研究广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前者，需要理论上的澄清，其中涉及何为质化研究中的“样本”的问题，也涉及质化研究所能达成的研究目的的讨论；而对后者，则要在理论澄清的基础上给出原则性建议。

一、当我们谈质化研究的样本时，我们到底在谈什么

在Denzin、Lincoln所编写的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一书中收录了Bent Flyvbjerg的Case Study一文，其安排表明以个案的方式展开是质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和基本策略，这里的个案当然并非仅仅指数量上的“一”，更准确地讲应该是小样本，这就是通常所讲的质化研究根本就是小样本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个案研究本身不是一种方法的选择，只是对样本选择的界定，个案研究中不管是对单个个案的研究，还是多个个案的研究，其研究对象都属于小样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质化研究都可以看成个案研究。

Bent Flyvbjerg在文中明确指出，因为我们常常对科学研究持有以下五个假设而使个案研究价值被曲解：①我们通常假设普遍的、理论化的知识比具体个案的知识更有价值；②通常认为我们不能根据个案进行推广，因此，个案研究对科

学的发展没有任何贡献；③通常认为个案研究最大的用途仅在于产生假设，因此个案研究只是整个研究过程的第一步，而其他方法则在假设检验以及理论建构上被认为更恰当；④通常认为个案研究包含了证实的偏向，因此个案研究被认为不过就是去验证研究者先入为主的概念罢了；⑤通常认为仅仅根据对特殊个案的研究，很难概括和发展出普遍的建议和理论。

该研究中所指出的围绕个案而招致的曲解其实讨论的也正是学界对小样本的质化研究最常见的“偏见”。随后，Bent Flyvbjerg从这五个“曲解”出发逐一辩解，尝试为个案研究“正名”。其中在对基于第5个假设而来的反驳上，Bent Flyvbjerg从个案研究与叙事研究的紧密关联出发，指出个案研究本不在于概括和发展普遍理论，而应该通过格尔茨所言之“深描”对个案不同层面做开放式的呈现，个案故事本身就是研究的结果（result），在Bent Flyvbjerg看来，以此不同读者便能读到不同的东西。一方面，笔者非常认同质化个案研究都有叙事的特征，即个案研究的“深描”及开放性等特点，但另一方面，笔者也认为在此基础上需要继续追问：个案研究对个案的“深描”所得到的知识就仅仅是“具体个案的知识”吗？与此相关的问题则是：在质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当我们谈论小样本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什么？当用质化方法研究个案时，我们又到底在研究个案中的什么？

每年审阅研究生论文或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常常会看到类似这样的题目：《大学去行政化研究：以××大学为例》《义务教育均衡化研究：以四川××县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为例》等。再进一步阅读论文的内容，最常见的“套路”就是先总论，然后描述个案学校或个案区域的情况与做法，最后再做宏观的讨论或建议。在这些研究中，个案描述多为就事论事，给出了有关个案的信息，但其中看不到个案与周遭情境以及研究所讨论的宏观问题或建议有何关联。因此，无论其研究中的逻辑还是研究的价值都备受

质疑——从研究最后的落脚点看，拟想提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或建议，而仅有的对个案孤立信息的描述又根本无法支撑。

其实，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小样本的质化研究，无论是单个案还是多个案的研究，虽然做出来的“成品”多被学界所诟病，也确实可能有的“质性研究做得惨不忍睹”，但每个质性研究在一开始它想要（被期待）实现的目的一定不仅仅在于个案本身孤立的信息点，其后必然有更普遍的问题关心或主题关注。换句话说，质化研究通过小样本展开，但其中无论是单个案或多个案都只是进入某个问题或某个主题的切入点，而背后的问题或大主题才是研究的真正落脚点。因此，正如卢晖临及李雪等所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无论研究者多么谨慎，无论他们多么刻意地限制自己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他们事实上都有走出个案的学术抱负。

质化的小样本研究何以能走出个案？在笔者看来，其基本前提在于个案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即个案并非孤立的单一存在，而是与周遭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社会性存在，无论是个体人、组织或事件，都是被宏观结构所形塑的微观存在，并处于社会历史时空的意义脉络之中。实际上，在质化研究中，当我们在谈个案或小样本时，我们谈论的不是个案本身，或者说个案本身并不构成“研究对象”，个案所凝聚的研究所需要的信息才是研究的真正关心所在，即研究对象。可以说个案只是研究的“场所”，或者说是“研究对象”——回答研究问题的种种“信息”的“载体”。例如，在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的研究中，研究者关心的问题是，“当国家与农民在土地下放、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后的新时期发生集体上访这样的正面遭遇时，权力是如何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实践中运作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通过对平县山阳乡长达20多年的移民上访及政府摆平过程的细致展现”，来对研究目的加以实现。在研究中，“平县”“山阳乡”都不是研究真正的兴趣所在，吸引研究者的是在这个场域中充满了与宏观社会结构紧密勾连的复杂权力实践，而这正是研究所想探究考察的内容；研究中所涉及的关键人物或者是故事报道人，亦同样，研究不是在个体取向的层面上对其加以关注，研究的兴趣在于这些“个

案”足够复杂、足够丰富，他们长达多年深度参与上访，其经历就是权力双向实践运作的场，从对这些关键人物的故事讲述中能将宏观社会结构的复杂矛盾连根带出，关键人物及其相关事件在研究中频密出场，但并不是为了“塑造盛大的、个性鲜明的、充满了偶然性的形象和事件，而是要展现行动与制度之间复杂的、‘适合的’因果关系”。

也正因此，应星曾特别指出，质性研究个案选取，需要担心的不是其代表性问题，真正需要焦虑的是个案的复杂性，这种复杂“不仅仅是指场面的壮阔，声势的浩大，人物的繁多，过程的曲折，关系的交错，事件的叠起，时间的漫长，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从中能感受到心灵的颤动”。如果没有复杂个案所能提供的丰富材料，研究的“叙事就可能是干巴零碎的”。

叙述至此，我们看到，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质化研究，在研究中当我们谈论样本、个案时，指向的是镶嵌其中的具有普遍社会意义上的个案特征，而非个体意义上的个案本身，所以，人类学者格尔茨早在其《文化的解释》中就明确表示，“研究的地点不等于研究的对象。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部落、小镇、邻里……）；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个案研究所做的工作不是超越个案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概括，即将微观阐释与宏大情境结合起来，而不仅仅停留于微观描述。格尔茨不仅指出了个案研究普遍意义实现可能的基本前提，实际上也指明了个案研究的目的和基本实践路向。

二、当我们展开质化研究时，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在笔者的质化研究方法课上，学生们对方法的认识，课程之初大都局限于技术层面，他们期待像学习使用SPSS、Stata等统计软件一样，一招一式学会访谈、参与观察、编码……当仅仅把方法停留于技术层面，而对其后的逻辑、哲学假设不察不问时，质化研究者常常会因为难以回应对其研究之“科学性”“客观性”等质疑而陷入困境，迷惑于质化研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不清楚质化研究究竟要走向何处、达成怎样的目的。

所谓研究，狭义上讲，是研究者自觉使用特定方法探究世界各个不同方面以达成可靠知识获得的行为，在这一界定中，研究涉及几个基本要

件：研究者、研究方法、认知对象（世界的各个不同方面）、可靠知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所面对的对象世界——社会现实都有哪些面向？都有哪些类型的知识？对于社会现实不同类型知识可以采用什么方法获得？这些问题，追问的是方法技术面向其后的本体论、认识论假设，以及相关的方法论问题。在Peter Berger、Thomas Luckmann的《知识社会学：社会实体的建构》一书中，作者从制度的确立以及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展开分析，指出在本体论上社会现实包含“客观的现实（实体reality）”与“主观的现实（实体reality）”两个不同面向。世界是什么的本体论假设，直接关联到关于世界的知识分类以及相关知识获得的途径与方式，也构成了探讨研究方法的逻辑起点。从本体论的客观主义出发，延展出来的首先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经验实证主义范式，强调“现实”是固定不变、可观察、可测量的，是等待被发现的“他者”，被研究者转换成各种可以操作的变量和数据，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主客对立的关系，研究者被要求保持价值中立，借助一套外在于人的标准化的严谨程序与技术，去实现研究发现，进行知识生产——科学研究，在具体方法取向上是典型的量化研究方法；而从立足主观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假设出发，是解释诠释主义范式，强调多元的社会现实是由个人的社会性所建构的，社会现实的建构是一个过程，对过程和经验的理解构成了知识，这种知识通过归纳、生成假设和理论的探究模式获得，即质化研究方法。

与不同方法取向背后的知识假设相应，Ragin对不同方法类型的研究目的进行了梳理并指出，量化研究首要的目的是验证、优化理论、做出预测等；而质化研究则指向意义解释、帮助发声、提出新的理论等。在此，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需要确立一种自觉意识——当我们在展开一项质化研究时，如果套用量化研究的目的标准来评判研究的价值，显然有失恰当，对话基础不一致，也不会有共识；二是需要清楚质化研究之目的——所谓的意义解释、帮助发声、提出新的理论——到底指什么？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浮生取义》等研究来加以理解。

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这一研究中，研究者应星通过对其在平县所接触到的三峡移民上

访故事的讲述展开研究，但研究并不是停留于孤立个体移民上访“事实”的诉苦式唠叨，而是仅仅围绕研究拟要探究回应的研究主题——在发生新时期集体上访这样的正面遭遇时权力是如何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实践中运作的，以研究者所接触、调查的关键人物——在各种重大冲突事件中集中了更多复杂权力关系矛盾的小人物的叙事，带出对大河电站上访史的追溯，并将移民集体上访这一冲突事件案纳入农村社区的权力关系中去分析，研究无论是正文的故事讲述，还是正文之后的尾注，既有在场感的鲜活，更有研究者清晰的问题意识，而更重要的是叙述通过与已有理论对话而展开的对事件整体性的解释。故事带来的鲜活在场感，把读者拉入了研究的场景中，每个读者因此在其中都能受到震动并有所思考；研究者清晰的问题意识及与既有理论的对话，把读者带入了对事件本身以及相关现实的权力实践运作问题更普遍的理论思考和意义解释。虽然研究并没有在结尾处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更没有理直气壮的提出所谓的政策建议等内容，但笔者认为叙事本身其实就是该研究的发现和意义所在。在我们似乎熟悉的日常以及各种冲突事件的表象中，研究以其深厚的理论修养及社会学想象力，转身现象的背后，发现了看似散乱的种种事件、个体叙述背后脉络清晰的结构力量和意义之网，而在更为开放的叙事中，研究又给每个读者留下了思考表达的空间，文本与读者对话也成为可能，这正应了法国哲学家Ricoeur在讨论叙事时所说，叙事永远都只能在读者中完成，即叙事不在于告诉读者某种真理性的确定，而在于与读者形成对话达成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拿大学者Conle认为可以将叙事看作一种沟通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

吴飞的《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被誉为“全球范围内迄今为止关于自杀问题最认真的田野研究，也是涂尔干以来最优秀的自杀研究”。在这一研究中，研究者改涂尔干对自杀问题研究的基本路径，以质化研究方式展开。“自杀问题”本是一个较难进入的主题，也是受访者很难言说的话题，故事讲述极易陷入个案悲情式诉苦，然而，研究者在田野考察和文献的基础上，以其丰富的“经验感受力”意识到，自杀在中国当代社会，更多无关医学，而

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发生在公共社会空间之外、家庭中的“社会问题”，其涉及的是私人的公正与冤屈，与私人幸福生活相关，因此，从自杀现象直接带出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秩序中的委屈和公正？而理解自杀问题的关键也变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在意的公正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乎中国文化日常实践的问题。问题意识带来从研究现象到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对自杀个案的关注只是进入研究问题的切入点，研究不是要去从直接关联的平面角度寻找自杀的个体性因素，而是把其置放到中国文化的脉络中进行解释，并进而从文化的角度对自杀在中国情境下的表现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其实，质化研究目的是什么很难在具体层面一一罗列界定，但有两种显见的情况一定有违质化研究之目的，一是像既有一些质化研究习作那样，仅仅把叙事变成了“说点情况”；二是将研究仅仅停留于个案孤立材料的汇集，这都是质化研究者需要警惕和避免的。

三、当我们研究指向超越小样本时，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

在选修质化研究方法课程的研究生同学中，以笔者的观察，有很大一部分皆因“学不懂统计”，所以来“选修质化研究方法”。在这些同学，多持有一种假设：质化研究比量化研究容易——提问对话、归纳总结谁都会，所以访谈、资料整理分析也自是简单。显然这低估了质化研究的复杂程度，与此相应的是对质化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的轻率与随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认为质化研究强调保持开放进入田野，因此不需要理论的准备；第二，认为质化研究以小样本展开不讲代表性，因此个案选择基本是随手方便抓取；第三，认为质化研究不讲推广性，因此资料分析只是就事论事。如前文所言，实际上，质化研究都有走出个案的雄心，即使看课程内的习作，也能发现同学们多有寻求超越个案得出更普遍结论的企图，但以上提及的对质化研究的种种低估或误解，却实实在在阻碍了走出个案的实现。前文第一部分已指出社会科学中“个案”所具有的普遍社会意义上的特征是质化研究能走出个案的基本前提。因此，这部分，笔者将结合相关研究和自身实践，探讨如何回应以使质化研究迈向更大意义成为可能。

质化研究超越小样本，首先是要提出超越具体个案现象层面的问题，即在现象关注基础上有更大的问题关心，研究问题要有清晰的研究主题所属，有明确的核心概念，围绕这一核心概念能将研究置放在相关学科、学术研究议题脉络里展开。譬如：当我们观察到在当前小学数学课程教学中很多老师对新增的综合实践活动内容觉得无从下手，而拟定要研究小学课程改革中如何开展数学综合实践活动时，如果研究问题提出仅仅停留在“为什么很多老师不知道如何开展数学综合实践活动”这一具体现象层面时，一定难以摆脱局限于个案本身的工作总结式的思路，只有平面化的铺陈而不会有纵深；因此，我们需要找到研究关心所属主题——这是一个课程研究中有关“课程实施”的问题，相应的，研究便围绕“课程实施”这一核心概念、在课程实施基本理论以及数学综合实践活动实证研究等文献梳理基础上，提出明确的研究问题并在这一议题的知识脉络和情境脉络中展开。

这里所言之找到研究关注所属主题、关键概念等，其实背后指向的是研究者的学科立场意识、理论修养等问题，以笔者之见，这是质化研究达成更普遍意义的根本所在。吴康宁先生在讨论教育社会学何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时，曾提出，“学科之眼乃是学科赖以相对独立的首要基本条件”，学科之眼即一门学科看待社会现象最核心的理论概念——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学科“眼睛”，如政治学的学科之眼是“权力”，经济学的学科之眼是“利润”，社会学的学科之眼为“社会平等”。不同学科之眼对同一社会现象之观察，会看到不同研究对象，进而提出不同研究问题，如：当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同时走进一间挤满80个孩子的小教室听课时，他们直观到的眼前景象——教育现象——是一样的——小学大班额的现象，但对此，他们可能关注点完全不同，提出的问题也相去甚远，教育社会学家可能会问：谁的孩子——什么社会阶层家庭的孩子在这样的学校上学？这么多学生的班级——教育过程的关系公平状况如何？教育经济学家可能会问：从成本—效益看，小学多大的班级规模是恰当的？教育法学者则可能问：在这样的教室里，孩子平等的学习权如何保障？由此，以笔者的理解和体验，清晰的学科视角、厚实的理论修养是我

们观察社会现实时赋予我们独特敏感性的源泉，也是研究者能从研究现象抽象出有意义研究问题的基础。

在个案的选择上，教科书里对质化研究的“抽样”通常都会介绍“目的性抽样”。目的性抽样有其理论的合理性，但具体到实践，质化研究个案的选择标准本身很难用意义有限的条件加以框定，即使罗列标准，机械地对照条目寻得个案通常也难满足“典型性”“复杂性”等要求。实际上，正如应星所讲，寻找一个绝好的复杂个案其实极其困难，可遇不可求，有时甚至需要碰运气，既然是运气，自然不是每个研究者都能碰上，而且有时碰到了也未必能被研究者意识得到、抓得住。如何能“抓”到“好”的个案，这同样有赖于理论修养，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与敏锐的经验直觉。

从对研究现象的关注，到有着清晰主题所属、有普遍意义的研究问题的提出，到最大程度凝聚了回答研究问题所需信息的样本选择或抓取，接下来，是对个案的分析和解释。在质化研究中讨论超越个案，格尔茨从对研究场所与研究对象的区分，提出了人类学解决之道——在个案中概括，即研究不是要从个案中寻找普遍性，而是对个案中具有重要意义特征的解释与概括，这种解释与概括在与相关概念、理论的比较与对话中展开。由此，微观个案与宏观勾连，并被纳入特定研究主题的既有知识脉络之中，无论是对既有理论的拓展还是支持性回应，超越个案迈向更大意义成为可能。罗伯特·K·殷在《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中提出分析性概括的策略，其实与此路向基本一致，所强调的亦是理论对话。

在推动质化研究更大意义现实的路径上，如果说格尔茨提出了人类学的解决之道，那布洛维的扩展个案研究无疑是给出了一条社会学的解决路径。在这一路径中，其基本前提假设是微观存在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关联，一方面是所有个案日常都并非孤立自在，而是与周遭宏观有着紧密关联，另一方面是任何宏观结构都并非抽离悬浮，而都要落实到微观具体的日常实践，两者互动不断生产出社会存在之基础。所谓扩展个案研究，在布洛维那里，是在个案研究中做立足点的转

移，研究专注的焦点不是个案现象描述，而是转向个案背后的宏观结构，将个案所置身的社会情境脉络当作经验考察的对象，从有关国家、经济、法律秩序等已有的一般性概念和法则开始，去理解那些微观处境如何被宏大的结构所形塑，其逻辑是说明一般性的社会力量如何形塑和产生特定环境中的结果。这一策略，与前文对质化研究目的的讨论是一致的，而在前文所提及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浮生取义》的研究中都能看到这一研究进路。此外，蓝佩嘉的《跨国灰姑娘》以及刘邵华的《我的凉山兄弟》等研究中也都有清晰的体现，无论是蓝佩嘉研究里的“灰姑娘”们——台北东南亚的女佣，还是刘邵华研究中的“凉山兄弟”，她/他们的个体境遇，都是研究者进入研究的切入点，但研究的落脚点却在对其后形塑他/她们的力量的挖掘与解释。

在质化研究中讲超越小样本，其实并没有一个技术性的现成工具可以直接拿来用，无论是在问题提出、个案选择以及分析中对理论的强调，还是对布洛维扩展个案研究法的介绍，与其说是在谈论方法、策略，不如说更是一种方法论意义的提醒——研究中需要确立起理论的自觉以及见树又见林的社会学思维。

四、结语

渠敬东先生在接受《文化纵横》杂志的访谈中，表达了对当下社会科学研究中“方法主义”的忧虑，直陈“认为只要找到确当的方法，便能够发现和解析一切现实经验及其历史过程”的方法神话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危害，并指出好的社会科学研究，一要“讲理”，二要“动情”，而所谓的“讲理”“动情”则基于经典理论对个体心智的启发以及丰富现实生活历程而来的充分的经验感受力。对此，笔者深以为然，甚至也认为质化研究在讲求方法的小心谨慎的同时，更需要培养一种善讲理能动情的精神气质。

（罗云，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张雯闻，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广州 510642）

（原文刊载于《全球教育展望》2018年第6期）

教育研究过程中的失真性问题反思

刘晓红 李醒东

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需要使用各种方法，无论是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或是混合研究，我们都希望所获得的数据或材料是“真实”的，研究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更加接近客观事实。究竟何为“真实”？是关于表述的准确性还是实证性研究的科学性抑或质性研究的原始性是本文首先要理清的概念。

作为教育科学研究的两种范式，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差异：定量研究以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等为基础，追求的是科学精神；定性研究以建构主义、现象学、批判理论为基础，弘扬的是人文精神。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以旁观者和局外人身份存在，对研究的功用保持中立态度。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本人就是研究工具，扮演参与者和局内人的角色，容易对研究产生影响。因此，定量研究中工具的科学性以及研究者的科学精神影响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定性研究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主观意识影响研究资料的真实性，从而决定研究的可信度。可见，教育研究中的“真实”，即让研究不断地接近客观的事实，以及更接近研究者主观建构的意义。

学者对教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已有关注。目力所及的研究有贺腾飞（2014）从哲学角度入手，对所谓的“真实性”进行过哲学的探讨，对于真实性在哲学中的认知，以及探求真实性价值标准进行思考。杨开城等（2010）提出要建构科学性的教育理论。满忠坤等（2011）也撰文探讨“论教育研究的科学性”问题。马培培（2016）撰文探讨“复杂性视角下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危机及出路”，开始关注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张济州（2006）撰文《论教育“叙事研究”的科学性——兼与许锡良同志商榷》探讨质性研究的科学性问题。笔者也于2007年对科学研究中资料的真实性问题进行过思考。研究有的从某一方面的失真性进行探讨，有的对“真实性”问题本身进行思考。可以说学者开始关注教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但没有进一步地推进和

深入。本研究则在失真的类型以及如何避免失真问题上进一步思考，更加聚焦问题本身，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教育研究本身的反思，促进研究更加走向科学的状态。

一、教育研究过程中的失真性问题何以存在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的“拟剧理论”中有两个基本概念：“前台”和“后台”。该理论认为社会和人生是一个大舞台，社会成员即演员。“前台”呈现的是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形象，“后台”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的东西。通常人们会把他人和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匿在“后台”。如果把教育研究看作一个舞台，教育研究的成果表述即为“前台”。它是研究者在“后台”的精心准备下，将其以各种表达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从成果形式看，有研究论文、调研报告、著作等；从研究方法看，有文献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混合研究等；从研究国别看，有国内研究、国外研究和比较研究等；从研究立场看，有建构性研究，也有批判性研究。这些研究成果经过作者精心设计、编撰后，以一种特定的研究范式走到前台，传递着作者的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知识、研究的视角，以达到深化认识、改善实践的目的。人们习惯于欣赏阅读“前台”的表演，因为它的确从形式到内容再到价值引导，都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与编辑层层把关，呈现出相对完美的结果。读者相信研究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并高度认同或者与作者互动交流商榷。

问题是读者仅仅通过结果与研究者的互动，而并不知情研究过程。研究者如何查阅资料、采用何种方法开展研究对读者而言仍是一个“黑箱”。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研究者愈来愈认识到无论是文献研究、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单一的研究方法都存在失真的风险。为提高研究的可信度，混合研究方法逐渐被广泛使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三角互证法、田野工作法

等应运而生。

进一步追问的是，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可以保证研究的完全真实可靠吗？在教育研究这个大舞台，“后台”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发生的情境如何？故事中的主人公又是如何表现的？诸如此类问题的交代正是作者对读者最为负责的回应。即使是在艺术舞台上，观众也渴望了解前台演员的后台生活，更何况作为科学的教育研究。在教育研究这个舞台，作为读者的观众有权利了解研究的“后台”，而这正是作者的教育研究过程。“后台”的状况不是读者可以自己发现的，而必须由作者真实地提供出来，因此，作为只有研究者自己操作的研究过程就一定存在失真风险。尤其是对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而言尤为如此。正因为“后台”走向“前台”实际上起到了一种监督研究诚信、保证研究真实可靠的作用，因此，让研究过程走向“前台”也便具有了更大的伦理价值。

二、教育研究过程失真性风险的表现

（一）定量研究各环节的不规范带来的失真风险

定量研究范式认为在人们的主观世界之外，存在一个客观且唯一的真相，研究者必须采用精确而严格的实验程序控制经验事实的情境，从而获得对事物因果关系的了解。因此，定量研究强调在研究设计、数据收集、结果的处理与解释上必须具备严格的形式，由此出发，定量研究形成了包括严格的抽样技术（随机抽样）、量化的资料收集技术（调查、实验）与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资料分析技术（描述统计、推断统计）在内的一套完整方法体系。只有确保研究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科学性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和诚信。

1. 研究设计中的失真风险。研究设计包含研究假设、研究工具、取样。对于一项定量研究，这是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需要科学精神的环节。以问卷设计为例，如果研究者采用国外测量工具，必然存在测量工具本土化问题。如果是自己设计问卷，也需要对问卷和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在整个问卷和量表本土化和制定过程中，是否严格按照科学量表设计要求来严谨地确立自己的研究工具，有没有进行初测和试测，并反复修改研究工具，是研究者没有任何观众情况

下的“后台”行为，也是考量研究者诚信的关键。研究工具的信度和效度决定研究的科学性。

研究设计中的取样同样存在诚信风险。误差在研究中是允许存在的，如果按照严格的理论来取样，误差也会降到允许范围之内。问题的关键是执行中是否做得到严格和规范呢？这种“后台”行为通常是无人监督的区域。因此，失真的风险必然存在。

2. 数据收集中的失真风险。数据收集涉及问卷的发放、回收、统计等环节。其中存在失真风险的地方在于：接受调查的具体对象是谁？他们的状态如何？问卷分发的情境如何？回收的过程又是怎样的？有时候，对于一个随机的调查，如果为了吸引调查者到场，会有一些“物质的诱惑”，如此，必然存在某些人为了物质的目的来参与调查，而这些恰恰不是研究想要的调查对象。

对于一项学校的调查，谁能保证学校推荐给研究者的班级不是被他们筛选过的，已经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班级和学生？问卷分发时学生的状态如何？是在疲劳状态下还是精神良好的状态下？调查是在一节课的开始阶段还是即将结束阶段或者其他阶段？学生心情和调查的时间段必然影响对问卷态度认真与否，影响数据的真实性。

3. 结果处理上的失真风险。研究结果的处理过程是一个庞大的数据统计与分析工程。对于一个大样本的调查而言，数据处理相当烦琐，有多少人参与数据统计？统计是在什么环境下进行的？统计者连续工作多长时间？有没有疲劳工作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过什么和这个环节相关的事情？比如，有没有因疏忽数据没有保存而丢失的现象？参与的人员责任心如何？负责人有没有在场监督？这些状况直接影响数据结果处理的完全真实性。尽管研究允许有一定的误差，那么，这个误差要保持在哪个范围内算是合理的？

4. 结论公布上的失真风险。数据统计结果出来后，通常要实事求是公布研究结果，并提出研究结论。如果研究结果与研究假设一致，并验证了假设，那么，这样的研究应当相对完美。如果研究结果不能验证研究假设，一种情况是，可以得到与假设相反的结论，对于研究者而言同样也

是一种研究结论。另一种情况，是否存在一种可能，研究者会为了契合验证假设而篡改数据？

我们相信研究者绝没有主观造假的意愿，我们不需要进行监督，但是，这并不是研究过程隐匿“后台”的理由。研究过程的呈现至少可以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调查场景，这对于研究结果的分析以及研究结论而言至关重要。读者有权利了解研究过程的真相，以便于更好地理解研究，与研究产生共鸣。

（二）定性研究中情境的非自然状态带来的失真风险

定性研究以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与建构主义为哲学基础，同时解释学、现象学、符号互动论以及社会批判理论等思想也对其具有重要影响。定性研究范式同样包含理论假设、研究设计、数据收集和解释等。它虽然不像定量研究那么用科学的方法搜集资料，但是同样追求真实的结果。它的真实性更多地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包括参与与非参与观察、无结构与半结构访谈、案例分析、行动研究、历史研究、人种志法等多种形式。在解释环节上，我们不强求统一规划，但持有基本的价值中立是必须做到的。

1. 双方的信任度影响研究的真实性。访谈法是定性研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数据收集方法。访谈过程中，访谈者要想获得真实的数据，除了需具备相应的专业访谈的技能外，还需要和被访者建立一种信任关系，这是一种情感投入。如何把握这个度很关键。过度的信任和亲密会使访谈者的价值很难保持中立。在描述现象和资料时有没有价值引导？有没有自己的情绪和同理心夹杂进来？任何一点都会使其呈现的文字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读者是要了解真相的，主观性的描述和分析可能会掩盖部分事实。此外访谈者自身的状态如何等都会使研究具有一定的失真风险。

2. 访谈者双方的状态及情境影响结果的真实。定性研究特别要求在情境上格外小心。尽管要求特意安排环境以更接近真实，但是还要注意的是被访者的情绪状态以及前后一段时间围绕他是否有特殊事件发生。资料收集过程中被访者的状态如何？有没有情绪波动？有没有被价值引导？被访谈者的状态如何？有没有特殊状况？访谈的过程有没有意外事件发生？访谈是否按照原

计划的时间方式进行？当时访谈的环境如何？有没有意外发生？

当研究者进入现场观察时，此刻的情境是否是一种常态环境下的观察？所有这些看似与研究内容无关的内容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观察访谈效果，即资料收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这些所谓“后台”的情境，作者非常有必要给读者呈现，也是研究大舞台的重要一幕。

（三）混合研究中存在拼盘式组合增大了两种风险存在的可能

研究实践表明，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定性与定量两种范式相结合的方法可以丰富研究结果，提高研究质量。有研究者指出，正是由于定性与定量两种范式在研究姿态、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策略以及研究者自身的位置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别，二者的结合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点，组成最适合研究所需的混合型研究模式。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来看待研究问题，从而根据具体研究问题选择适宜的研究方法。可以在研究总体设计上结合采用两类研究范式，使得研究臻于完善。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结合起来，形成混合型的具体研究方式。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也可以结合采用不同范式体系中的具体方法，以丰富研究结果。

混合研究方法看起来很美，似乎摒弃了单一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弊端，理应是完美的组合。但是在实践中不难发现，混合研究设计正从类型视角转向协和视角。正因为协和视角将量化和质化看作同等重要，因此研究中极易出现二者平分秋色的状态，使混合研究方法处于拼盘式的融合，关注形式上两种方法的比例，却仍然忽视了协和视角的融合过程，尤其在成果表述上没有呈现过程。看似混合的研究与单一方法的研究并没有质的改变。缺乏“后台”呈现的资料，前台呈现的风险就不可避免。

三、降低教育研究过程风险的努力

（一）还原真相是保护读者的知情权

1. 读者了解研究的“后台”是为了更好地与研究对话。长期以来，教育研究的“前台”只有研究者在独舞（研究者自说自话），很少与观众（读者）互动。偶尔有些互动交流、商榷之类

的文章，也在读者一篇商榷文章发表后而戛然而止。很少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激烈的教育论争情形出现。整个教育研究的舞台是：台上研究者粉墨登场，自说自话，研究成果接二连三，却并不关注对观众的效用；台下读者要么不屑一顾，置之不理，要么虔诚膜拜，引用转载。也有观众窃窃私语，似懂非懂。更多情况是这些研究成果安静地躺在某个地方，等待作者晋升晋级时被作者启用，或者在必要时被相关同行所关注。

教育研究的“舞台”和实际生活中艺术大舞台不同的是：后者纯粹是看热闹的，他们观看表演的目的在于娱乐开心，演员和观众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二者不需要进行专业对话；而前者的观众（读者）是内行，演员和观众是同行，他们要彼此切磋与交流。这就需要有一个前提，即读者需要了解研究者的研究背景，研究者需要把读者拉到研究情境中去，使读者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读者才可以与研究者产生共鸣与共识。就像文学作品一样，读者必须身临其境才可以与作者深度对话。

2. 读者具有了解研究过程的知情权。既然研究者与读者处于一种对话的关系，就要有对话的前提。分析语言哲学认为人们在对话交流时，双方需要拥有一个共同的话语体系，包含所使用的概念应该统一，而不是各执一词；双方要了解彼此的谈话前提和背景，这样讨论才可以进行下去，否则可能自说自话。

对于教育研究的对话双方，研究者先抛出一个话题，读者要进行对话交流，首先要了解研究背景。这一点研究者通常会在文中有背景交代，除了背景的交代之后就研究结果的呈现和分析，实际上省略了非常丰富和复杂的研究过程，使研究成了一个黑箱，难以令人信服。正如警察在断案时，仅仅发布一个案件的结果。在民众还没有更多的有知情权需求的情况下，一个结果足以解决问题。而今人们的维权意识逐渐增强，也开始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和追问：这个结果是嫌犯主动真实的交代还是刑讯逼供的产物？案件处理的过程是怎样的？有没有虚假草率的成分存在？同理，教育研究结果的呈现非常容易，数万字的研究报告和一系列的数据真的科学、真实吗？这并非是在怀疑研究者的动机，但是主观的

失误是必然存在的，而这个失误绝不是研究允许范围内的误差。呈现研究过程的目的在于读者可以与研究者共同对话与交流，因为了解研究过程应该成为读者的知情权而被不断强化。

3. 还原真相体现的是一种科学精神、学人风骨。学术伦理一直是学者进行研究时始终坚守的道德底线。学术伦理要求学术研究要遵循诚实原则，在学术规范中表现为不抄袭剽窃、不造假；不捏造数据或结果，不破坏原始数据的完整性，不伪造拼凑篡改科学研究实验数据、结论、注释或文献资料等。这些规范所涉及的问题正是呈现研究过程必要性的体现。一位真正具有学术伦理精神的研究者，就要具备求真、求善、求美的品质，需要高度的自觉自律精神，真正诚信研究。

通常情况下，研究者的学术伦理动机毋庸置疑。很少有研究者在主观上希望自己研究成果有不端的行为，我们更要关注的是非主观的学术伦理出界现象，由客观原因造成的学术失范行为的产生。如何使读者对作者的研究成果深信不疑，并乐意将此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参考，需要研究者拿出足够的底气证明自己的研究是科学严谨的，是经得起推敲和检验的，任何一个环节和细节都可能存在致命的弱点。因此，研究者当有勇气呈现研究过程的每个细节。这既是一种科学研究应有的求真求实的精神，也是作为学者的伦理风骨。

当然，此处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可能会被质疑：谁能保证作者呈现的研究过程就是真实的？也许作者是经过筛选后，呈现了他（她）认为合适、不被质疑的内容呢？若真如此，问题似乎就成了无限循环的无解之题了。回到客观现实，我们不做这种性恶假设，我们相信研究者会真实地呈现研究过程。这是道德底线不可突破。

（二）真实地呈现研究过程的内容

在研究过程中，影响研究真实性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定性研究的情境和定量研究的数据统计分析。

1. 客观呈现定性研究中的情境和角色。首先，定性研究的资料主要通过研究者的实地考察、访谈来搜集，因此情境具有随机性，短时间的参与会使研究者具有偏见，偶然事件或季节性的活动会影响研究者的观察。资料的真实可靠性

受制于当时的情境、访谈者的状态以及受访者的状态。因此，研究过程应涉及研究者参与研究时间的长短，研究者是否留在现场，研究者是否充分获得了饱和的数据，并且要始终追求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分析。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中，需要研究者具有理论触觉，能以分析性眼光看到深层现象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能会因人而异，使研究具有一种主观性。同时，扎根理论需要研究者有比较高的访谈技巧和经验，不同的访谈者会获得不同的资料。在叙事研究方法中，被访者的情绪、当时的处境等也会影响访谈资料的收集。这些情境和访谈者、被访谈者的状态应该经由研究者的介绍走向“前台”。

其次，研究者可以采用三角互证法来相互印证。可以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可以寻求问题的不同来源或者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相互验证。可以用不同的手段记录材料，如录像带、照片、录音或者其他；还可以借助一个与研究无关的人员，从旁观者角度看待所研究的问题，也是验证信息的途径之一。这些也应该成为走向“前台”的内容。

2. 规范描述定量研究中的工具、样本与数据统计。定量研究中要涉及测量工具的确定、样本的选择以及数据搜集与统计等。严格意义上讲，工具要科学有效，外来工具要本土化。这个过程需要专业人士的参与并指导完成，是需要研究者向读者交代清楚的。例如：样本的选择过程，研究工具要尽可能呈现问卷的发放与回收的情境，调查的时间段，是否采用了物质奖励的方法吸引被调查者参与，数据统计分析时的状况，参与统计的人员构成，启用电脑的设备状况，数据统计的耗时，中间是否发生过意外事件，如数据丢失等问题，问卷顺序有没有被打乱、是否通宵熬夜工作等。

此外，在数据统计结束后进行分析过程如何？历时多长？运用SPSS软件是否熟练？中间有没有因为烦琐而失去耐心的时候？数据是客观的，而操作数据的人具有主观性。这些都应该是研究者推向“前台”的具体内容。

当研究者将真实的情境如实地描述的时候，一定程度上是研究者对自我的一种约束。这种约束不断促使研究者将研究做到相对完善，减小误

差。研究中的误差允许存在，前提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误差。主观的误差常常因不同研究者而异，因此也就多了更多的风险。科学性和真实性更多取决于研究的伦理精神。

主观误差的避免没有科学的工具来约束，靠的是研究者内心的良知。而真实地呈现研究过程恰恰是一位道德法官的存在形式。它的存在本身具有一种威慑力，使人按照学术律法行事，从而让研究更接近真实和科学。

（三）呈现研究过程的方式与可能

如何将过程呈现给读者？以下两种方式可以尝试。

1. 注释性介入。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可以尝试用注释的方式呈现研究过程。呈现的内容前文已经谈到，这些内容可以在文中以注释的形式加以说明。目的在于当读者阅读正文时可以随时了解研究者当时的状态，从而与研究者的达到共鸣，更深切体会研究情境，进而理解研究的结果。

例如，研究者在介绍研究背景时，通常会说投放了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50份，回收率90%。看似很简单的介绍，背后可能是复杂的过程。此处应该用注释加以具体说明：问卷第一次发放是在下午第一节课上课前进行，同时占用了几分钟课堂时间。由于校长没有提前给班主任交代，结果在学生答题几分钟后，班主任进来制止了这项工作，将问卷全部收回。后经研究者请示校长，校长与班主任沟通后，重新发放问卷，调查继续进行。

这一注释的合理性在于，调查的时间可能不是特别合适，因为下午第一节课，学生是要上课的，利用这几分钟进行调查会使学生应付了事。而且，班主任的制止暗示了她的不支持，也许会影响学生的答题真实性。当然，这是一个消极的注释说明，但也是真实的。更多时候，研究者是进行充分的准备的，同样的注释还有如下说法：研究者事前和班主任沟通好，调查工作放在周一的班会上进行。由班主任特别交代说明，并提示学生认真作答，调查进展顺利。简单的一个注释给读者交代了一个相对合适的调查背景，增加了调查的真实性。这一注释性的介入比较适合一般

（下转第27页）

学术履历对教育学者实证研究产出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2019年核心作者的分析

马银琦 姚 昊

一、问题的提出

自教育学创立以来，尤其赫尔巴特（J. F. Herbart）提出“教育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是以实践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科学”，有关教育科学研究的争议就从未停止。1890年，乔赛亚·罗伊斯（J. Royce）的《教育是一门科学吗？》问世，激发了美国教育学界对实证研究的高度重视，随之，“桑代克与杜威的实践经验，对早期教育学家建立公立学校的教育理论科学产生重要影响”。尽管近一个世纪以来对教育科学研究的争议此起彼伏，但实证研究如今已成为西方教育研究的主要范式，也成为美国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主要的思维方式。1980年，教育学在我国刚复苏之时，便有学者提出“教育学科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的观点；1989年，叶澜、陈桂生等也提出，“实证化是教育研究科学化重要步骤”，近年来加强教育实证研究的呼声更是不断高涨，尤其在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举办“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后，教育领域掀起一股实证风潮。

实证研究是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研究，强调运用科学的方法，获得科学的数据，得出科学的结论，接受科学的检验。这些“科学”的特性说明，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似乎对学者的专业研究素养提出了颇高要求。虽然目前国内教育实证研究成果落后于国外，但从近几年的发展态势来看，我国教育实证研究论文占比从2015年的34.4%升至2019年的38.6%，年增长率高达3.7%，可见教育实证研究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这些学者也成为新时期教育实证研究的先行者，引领其他学者形成新思路和新见解。然而，在这庞大数据的背后，哪些学者在从事教育实证研究？这些学者有哪些共同学术履历背景？这些履历是否对其教育实证研究产出具有影响？是否能对这些学者通过履历分析法进行检验呢？回应上述疑问，即是本研究的出发点所在。

探究学者的学术履历与教育实证研究产出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研究学者履历与科研产出的关系。佐治亚理工大学在1996年设立了research value mapping（简称RVM）项目，成为履历研究的拓荒实验。履历研究代表了科研绩效的范式转移，即从传统的量产范式转向能力范式。履历分析法是通过对学者的履历信息进行编码，进而研究学者的科研轨迹、成长路径等内容，同时避免了传统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中的主观性，从第三视角更为客观地对学者进行观察与分析。迪茨（J. S. Dietz）等通过对微电子相关领域学者的履历信息，揭示了科研机构科学家向工业界的流动情况，并研究了其在科研产出上的差异；福泽（N. Fukuzawa）基于日本医学领域的565名研究员的学术履历，发现医生的研究经验与科研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在国内，郭冉等对15个高水平生物学院429名青年教师进行履历分析，并运用科学界分层理论中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机制解释了性别、导师身份、学术事业观、博士后经历等是影响人才项目获得的主要因素。科研产出是普遍主义原则的出发点，而实证研究产出是科研产出的一种表现形式，关于学术履历与实证产出关系的研究，朱军文等收集了2015—2019年的563位教育实证研究核心作者的学术履历，从面上分析了作者年龄、职称、学科背景等信息的年度分布情况。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研究对象集中于自然科学类的人才或学者，鲜有对社会科学类或具体到教育领域学者的分析。在分析内容上，仅仅通过履历分析法描述统计学者的基本特征，而通过定量方法进一步检验影响学者科研产出的履历背景因素的研究较少。据此，本研究以2015—2019年教育实证研究的核心作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核心作者学术履历信息数据，探究影响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的学术履历因素，并分析学术履历背后的作用机制，以期改进我国教育领域的科

研人才培养模式，为建设高素质、创新型科研队伍提供政策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界定

实证研究产出指运用教育实证研究（定量、质性及混合）方法并发表的学术产出，在本研究中以在样本期刊上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数量（频次）为指标。

实证研究占比指作者的实证研究发文频次除以总发文频次的占比，反映了作者在教育研究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倾向性与熟练度。

学术履历指学者的履历书，是个体教育和专业历史的大纲。它区别于个人简历，强调的是个体教育经历与成果，如学科背景、职称、海外经历、就单位等。

核心作者指基于普赖斯定律确立的在教育实证研究中论文发表频次较高的作者，通过关注教育领域实证研究产出的“量”，反映出该领域学者的教育实证研究的活跃度。

（二）样本选择

本研究充分考虑内容的综合性、影响因子、二级学科分布及学界的认可度等因素，在教育类CSSCI来源期刊中选取《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比较教育研究》《复旦教育论坛》《中国高教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教育发展研究》《教育科学》《教育学报》《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教育研究与实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学前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16本期刊。

基于实证研究文献检索的特征关键词包，对“教育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细致筛选，最终从11605篇文章中筛选出了4343篇实证研究文献，实证研究文献总占比达37.4%，并在中国知网下载上述全部文献及实证研究文献的题录数据。

根据题录数据，通过Data数据园软件析出作者总发文频次和实证研究发文频次，并基于普赖斯理论确定本研究的核心作者范围。考虑到作者发文的周期性会出现年度差异，研究的核心作者主要由年度作者及总五年论文的作者构成，其中年度核心作者为发文频次达2次及以上的作者，总五年核心作者为发文频次达4次及以上的作者，在

对作者进行重名清理后，共得到685位核心作者。

（三）数据采集与编码

基于上述685位核心作者，从相关机构官方网站、百度百科、文献作者简介等平台获取了作者学术履历信息，其中有部分内容如海外经历及海外博士等信息缺失严重，笔者通过邮件询问的方式再次验证及补充相关信息，最终将部分缺失信息当作无效数据处理。检索的信息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等基本信息；第二部分包括身份职称、本科学校及学位、硕士学校及学位、博士学校及学位、现就读（职）研究机构、是否有海外经历、是否为海外博士等学术履历信息。

基于面上的学术履历信息，对部分内容进行编码处理：一是对所属研究机构的所在地区（东、中、西部）、机构类型（直属师范、地方师范、九校联盟、地方综合、其他）进行标签化处理；二是按核心作者的出生年份归为“1990年以后”“1980—1989年”“1970—1979年”“1960—1969年”与“1959年以前”五个区间；三是以本科、硕士及博士学位类型为依据，将学位类型分成13大门类，再将这些门类按照标签归为“不含教育学背景”“含1项教育学背景”“含2项教育学背景”及“含3项教育学背景”四种，从而分析核心作者的跨学科分布情况。

（四）模型建构与变量描述

由于研究选用的因变量（实证研究发文频次）为连续变量，自变量包括连续变量、分类变量以及等级变量，在数据初步分析的基础上，研究确定选用OLS模型进行估计，模型如（1）所示。其中， Y_i 为因变量， X_i 为表示自变量， ε_i 为随机误差。

$$Y_i = \beta_0 + \beta_1 X_{1i} + \beta_2 X_{2i} + \dots + \beta_k X_{ki} + \varepsilon_i \quad (1)$$

根据模型以及前文的研究综述，构建本研究的模型如（2）所示：

$$Y_i = \beta_0 + \beta_1 \text{sex}_{1i} + \beta_2 \text{year}_{2i} + \beta_3 \text{sphd}_{3i} + \beta_4 \text{sea}_{4i} + \beta_5 \text{type}_{5i} + \beta_6 \text{reg}_{6i} + \beta_7 \text{pro}_{7i} + \beta_8 \text{maj}_{8i} + \beta_9 \text{sumr} + \varepsilon_i \quad (2)$$

其中， Y_i 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的实证研究发文频次； β_0 为模型截距， sex_{1i} 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的性别； age_{2i} 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的出生年阶段； sphd_{3i} 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是否为海外博士； sea_{4i} 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是否有海外经历； type_{5i} 表示

第*i*个核心作者所属机构类型； reg_{6i} 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所属机构的地区； pro_{7i} 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的身份职称； maj_{8i} 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的学科背景； β_j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 $sumr_{ji}$ 表示控制变量（总发文频次）； ε_i 表示模型无法解释的残差，具体变量描述如表1所示。

表1 具体变量描述

变量	变量名	标签	定义及编码	变量类型	M	SD
因变量	实证产出	emr	实证论文发文频次	连续变量	4.02	2.44
控制变量	总体产出	sumr	总体论文发文频次	连续变量	5.90	4.43
自变量	性别	sex	0=女;1=男	分类变量	0.56	0.50
	出生年段	year	1=1959年以前; 2=1960—1969年; 3=1970—1979年; 4=1980—1989年; 5=1990年以后	等级变量	3.20	1.13
	海外博士	sphd	0=否;1=是	分类变量	0.14	0.35
	海外经历	sea	0=否;1=是	分类变量	0.39	0.49
	机构类型	type	0=其他机构; 1=地方综合; 2=地方师范; 3=直属师范; 4=九校联盟; 5=境外院校	分类变量	2.34	1.23
	机构地区	reg	0=西部;1=中部; 2=东部	分类变量	1.62	0.69
	身份职称	pro	1=硕士生;2=博士生; 3=中级;4=副高; 5=高级	等级变量	3.94	1.13
	学科背景	maj	本硕博学位获得: 1=含0项教育学; 2=含1项教育学; 3=含2项教育学; 4=含3项教育学	等级变量	3.00	1.04

三、研究发现

（一）核心作者的学术履历特征及差异分析

在个体特征上，实证研究产出在核心作者出生年段中有显著差异，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而实证研究占比在核心作者出生年段和性别上均有显著差异。如表2所示，在性别层面，女性学者达301人，男性学者达384人，实证产出差异性并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但是在实证研究占比中发现，女性实证研究占比相较男性更高，且存在显

表2 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及占比在个体特征上的差异

变量	类别	N	实证产出 M±SD	t/F	实证占比 M±SD	t/F
性别	女	301	3.81±2.30	-1.091	0.82±0.22	4.542***
	男	384	4.01±2.32		0.74±0.24	
出生年段	1959年以前	57	4.82 ^a ±3.98	6.223***	0.64 ^d ±0.26	11.931***
	1960—1969年	137	4.26 ^b ±2.42		0.71 ^c ±0.26	
	1970—1979年	150	3.98 ^b ±2.16		0.76 ^c ±0.23	
	1980—1989年	242	3.82 ^b ±1.91		0.81 ^b ±0.22	
	1990年以后	80	3.01 ^a ±1.67		0.87 ^a ±0.20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a—d 是多重比较的结果：字母相同，即均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字母不同，即存在显著差异；均分从大到小排列为a>b>c>d。

著差异，说明虽然在总体实证研究产出上，男生产出要高于女性，但女性在教育研究中更偏好运用实证研究方法。

在核心作者的出生年份方面，按照年龄递减的顺序，五个年龄段的学者人数分别为57人、137人、150人、242人和80人，实证研究产出在核心作者出生年段上存在显著差异，即年龄越大，实证研究产出越高，但在实证研究占比上却呈现相反的结果，“90后”及“80后”的实证研究占比分别为87%与81%，居于出生年段的前列，实证研究占比在核心作者出生年段中存在显著差异，年轻群体在教育研究中更偏好或擅长运用实证研究方法。

在学术履历背景上，实证研究产出在核心作者是否为海外博士、是否有海外经历、所属机构类型、身份职称、学科背景方面有显著差异；实证研究占比在核心作者所属机构类型、身份职称、学科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如表3所示。

表3 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及占比在学术履历背景上的差异

变量	类别	N	实证产出 M±SD	t/F	实证占比 M±SD	t/F
海外博士	否	594	3.80±2.21	-3.441**	0.77±0.24	-0.873
	是	91	4.69±2.79		0.80±0.22	
海外经历	否	407	3.52±2.03	-5.722***	0.78±0.24	0.892
	是	254	4.63±2.63		0.77±0.24	
所属机构类型	直属师范	207	4.11 ^b ±2.31	3.661**	0.73 ^b ±0.23	4.172***
	地方师范	102	3.53 ^a ±1.66		0.74 ^b ±0.24	
	九校联盟	111	4.41 ^a ±2.80		0.82 ^a ±0.22	
	地方综合	204	3.86 ^b ±2.48		0.81 ^a ±0.25	
	其他	60	3.25 ^c ±1.24		0.77 ^a ±0.24	
所属机构地区	西部	70	4.10 ^a ±3.07	0.681	0.74 ^a ±0.25	0.852
	中部	89	3.69 ^a ±2.53		0.77 ^a ±0.24	
	东部	515	3.94 ^a ±2.17		0.78 ^a ±0.24	
身份职称	硕士生	29	2.55 ^c ±1.12	10.251***	0.85 ^a ±0.23	20.853***
	博士生	81	2.99 ^c ±1.14		0.88 ^a ±0.17	
	中级	110	3.57 ^b ±1.75		0.85 ^a ±0.23	
	副高	192	4.01 ^b ±2.23		0.80 ^a ±0.21	
	高级	272	4.43 ^a ±2.74		0.68 ^a ±0.25	
学科背景	0项教育学	83	4.67 ^a ±2.85	5.371***	0.82 ^a ±0.22	4.402***
	1项教育学	95	4.48 ^a ±3.12		0.80 ^a ±0.22	
	2项教育学	186	3.84 ^b ±1.78		0.79 ^a ±0.24	
	3项教育学	263	3.70 ^b ±2.37		0.73 ^b ±0.25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a—c 是多重比较的结果：字母相同，即均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字母不同，即存在显著差异；均分从大到小排列为a>b>c。

在是否为海外博士、是否有海外经历层面，海外博士有91人，非海外博士有594人，海外博士的人均实证研究发文频次相对较高且差异性显著，说明海外博士在发教育实证研究论文上具有一定优势；有海外经历的有254人，没有海外经历的有407人，有海外经历学者的均实证研究发文频

次相对较高且差异性显著，同样说明了海外经历对于教育实证研究发文具有相对优势。

在核心作者所属机构类型层面，就职（读）直属师范的核心作者的有207人，地方师范的有102人，九校联盟的有111人，地方综合的有204人，其他的有60人，且实证研究产出及占比在核心作者所属机构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所在机构为九校联盟的核心作者实证研究发文频次最高，其次为直属师范。同样的，所在机构为九校联盟的核心作者实证研究占比最高，而所在机构为师范院校的核心作者实证研究占比排末两位，说明综合大学的核心作者在教育研究中更偏好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且易产出实证研究论文。

在身份职称层面，硕士生有29人，博士生有95人，中级职称有110人，副高级职称有192人，高级职称有272人，高级职称的人均实证研究发文频次显著高于其他身份职称的学者，而实证研究占比在身份职称上呈现了相反结果，即具有高级职称的实证研究占比显著低于其他身份职称的核心作者，这种“反差”与作者出生年份层面的结果一致。

在学科背景层面，本硕博无教育学背景的有83人，本硕博有1项教育学背景的有95人，本硕博有2项教育学背景的有186人，本硕博均为教育学的有263人，且实证研究产出及占比在核心作者的学科背景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跨教育学背景的学者均实证频次及实证研究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说明了跨学科背景的核心作者更偏向在教育研究中运用实证方法，且易产出实证研究论文。

（二）影响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的学术履历因素分析

本研究在差异分析的基础上，将连续变量（实证研究产出、总体研究产出、实证研究占比）及等级变量（学科背景、身份职称、出生年段）纳入相关性分析，计算变量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表4所示。出生年段与实证研究产出、总体研究产出具有显著负向低度相关性，而出生年段与实证研究占比具有显著正向低度相关性；身份职称与实证研究、总体研究产出之间分别具有显著正向低、中度相关性，而身份职称与实证研究占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负向

表4 实证研究产出与学术履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实证产出	总体产出	实证占比	学科背景	身份职称	出生年段
实证产出	1					
总体产出	0.684**	1				
实证占比	-0.009	-0.586**	1			
学科背景	-0.152**	-0.009	-0.135**	1		
身份职称	0.238**	0.347**	-0.299**	-0.078*	1	
出生年段	-0.179**	-0.298**	0.259**	0.078	-0.780**	1

注：*在 $p < 0.05$ (双尾) 水平皮尔逊相关性显著，**在 $p < 0.01$ (双尾) 水平皮尔逊相关性显著。

低度相关性；此外，学科背景与实证研究产出、实证研究占比之间存在显著负向低度关系。

从上述分析可知，实证研究产出与学术履历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但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总体产出变量的干扰，有必要进一步建构影响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因素的回归模型，在控制相关变量条件下，预测学术履历要素是否对核心作者的实证研究产出具有显著影响。

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OLS多元回归分析，构建学术履历背景（性别、出生年段、是否为海外博士、是否有海外经历、所属机构类型、所属机构地区、身份职称、学科背景）对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根据表5模型输出报告可知，OLS模型整体对于因变量核心实证研究产出的方差解释度达49.7%，属于中高解释效度。模型显示，若不考虑控制变量，所有预测变量中“海外经历”“身份职称”“学科背景”对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均有显著影响，在控制总体论文产出这一变量下，“机构类型”“学科背景”

表5 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影响因素的OLS多元回归模型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B	标准误	Beta		B	标准误	Beta	
截距 β_0	2.367*	0.954		2.482	2.200**	0.722		3.045
性别	0.045	0.199	0.009	0.227	-0.303	0.247	-0.060	-1.226
出生年段	0.061	0.133	0.030	0.462	0.107	0.099	0.052	1.087
海外博士	0.204	0.311	0.030	0.657	0.397	0.230	0.058	1.723
海外经历	0.641**	0.233	0.131	2.754	0.230	0.173	0.047	1.326
东部	-0.030	0.290	-0.005	-0.102	0.279	0.215	0.051	1.298
中部	-0.514	0.371	-0.074	-1.385	-0.065	0.275	-0.009	-0.237
身份职称	0.444***	0.135	0.217	3.294	0.038	0.101	0.018	0.373
学科背景	-0.170*	0.086	-0.079	-1.979	-0.342***	0.068	-0.149	-5.000
总体产出					0.361***	0.016	0.694	22.036
地方综合-地方师范	0.256	0.307	0.052	0.833	0.428*	0.198	0.102	2.154
九校联盟-直属师范	0.634	0.344	0.115	1.842	0.545*	0.254	0.099	2.142
VIF	<10				<10			
F	7.530***				64.271***			
R ²	0.093				0.497			
Adj-R ²	0.081				0.489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则对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有显著影响。

具体来说,在不考虑控制变量情况下,身份职称对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的影响最大($B=0.444, p<0.001$),每提升一个层级的职称水平,如中级升至副高,学者平均实证研究产出多出0.444频次。其次影响程度较高的变量为海外经历,有海外经历的学者相对于未有海外经历的学者,其实证产出高出约0.641频次($B=0.641, p<0.01$),但是否海外博士对实证研究产出却没有显著影响效应,说明短期出国交流政策对于提升实证研究产出的策略较为有效。

在控制总体论文产出变量的情况下,虽然受到总体产出影响较大($B=0.361, p<0.001$),但是学科背景对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的影响仍然凸显($B=-0.342, p<0.001$),本硕博阶段越多涉及教育学学位背景,相对而言在教育期刊发表实证研究论文的概率也会越低,相反,学科越交叉融合,更有几率产出教育实证研究论文;其次为所属机构类型,核心作者的所在机构类型处理主要分别对“地方综合-地方师范”和“九校联盟-直属师范”作哑变量处理,分析发现,地方综合研究机构的核心作者相对于地方师范研究机构的核心作者,其实证研究论文产出显著更高($B=0.428, p<0.05$),同理,九校联盟研究机构的核心作者相对于直属师范研究机构的核心作者,其实证研究论文产出显著更高($B=0.545, p<0.05$),这反映了所属机构为综合院校的作者,其掌握实证研究方法越规范,促进了教育实证研究论文产出。在控制总体论文产出变量条件下,身份职称、海外经历对实证研究论文产出影响不再显著,控制变量对自变量产生了替代效应,但系数仍为正,说明两者仍然是对实证研究产出有正向效应。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跨学科背景的学者更倾向做实证研究且产出更高,应鼓励培养具有跨学科背景的教育人才,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相融

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学者比纯教育学背景的学者有更高的实证研究产出,且学科背景越交叉,越擅长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其实证研究产出也就越高。交叉学科研究是一种团队或个人的研究模式,它整合了来自两个或多个学科或专业知识体

系的信息、数据、技术、工具、观点、概念和理论,以促进基础理解或解决其处理方案超出单个学科范围或实践研究领域的问题。交叉学科研究是创新的重要来源,也是推动教育实证研究发展和解决实际教育问题的最佳途径,然而,由于在教育研究领域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所以学者们主要采用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研究范式。因此,高校或科研机构要打破学科壁垒,培养具有跨学科背景的教育科研人才,进而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相融。

(二)综合类高校的教育学者更倾向做实证研究且产出较高,应加快师范院校教育研究范式向实证研究的转型

综合类高校的教育学者比师范院校更倾向于发实证研究论文,且九校联盟高校学者的实证产出显著高于直属师范院校的学者,地方综合院校的学者显著高于地方师范院校的学者。由于研究领域宽,传统深厚、师资队伍类型多样等原因,师范院校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的教育研究尚不普遍,实证研究产出及占比均相对较低。因此,师范院校要加快教育研究向实证范式转型,组织擅长教育实证研究的教师开设教育研究方法精品课程,与综合型大学进行跨校合作,加强教师与学生的实证研究方法技能培训,提高实证研究方法素养。此外,兄弟师范院校要继续携手办好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实证研究成果交流与展示平台,营造教育实证研究的新风潮。

(三)有海外经历的学者更易产出实证研究论文,在人才培养与引进环节中要注重对外实证学术交流,提升国际视野

具有海外经历的学者实证研究产出要显著高于没有海外经历的学者。虽然控制变量对海外经历产生了替代效应,但系数仍为正,对实证研究论文产出仍有正向效应。相关研究显示,国外教育研究方法远比国内成熟,国外教育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思辨研究为辅;国内研究则以思辨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为辅。长期以来,国内思辨研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对我国教育研究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思辨研究缺乏了系统的数据搜集与分析过程,导致论点的支撑性不足。具有海外经历的学者在国外受到了更为规范的实证研究

方法训练，对教育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也有所提升，故在人才引进与培养的环节要注重对外的学术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上的交流，进一步提升我国教育研究的规范化水平。

（四）年轻学者更倾向做实证研究但产出能力较弱，应适当提升对青年学者的学术关注度

年轻学者的实证研究产出显著低于年长的作者，但实证研究占比显著高于年长作者。虽然年轻学者的实证研究产出远远低于年长群体，但相对而言，年轻学者更易接受实证研究方法的训练，甚至比年长学者对研究方法的掌握更加规范，他们缺少的是一个展示实证能力的平台。因此，要客观对待实证研究产出的弱势群体差异，提升对年轻学者的学术关注度。一方面，期刊、

高校或研究机构更多关注年轻学者这一重要的人力资源，通过提供专项资金、开展相关教育实证研究会议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年轻学者的教育实证研究学术规范，给具有实证研究潜力的年轻学者更多的学术机会；另一方面，加强资历较深的实证研究学者与年轻学者的实证研究合作，通过以强扶弱的合作形式，加快实证研究创新，优化学术知识结构体系。

（马银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62；姚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6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9期）

（上接第21页）

的学术论文。当然，这里面存在一种风险：研究者是否有勇气将真相说出来？这就涉及学术伦理问题。

2. 后记式介入。对于硕士或博士论文，研究的过程会比较长，注释的方式不足以充分展示过程的复杂性。因此，在注释的基础上，以后记的形式将整个研究过程呈现出来是合适的且尤为必要。除了注释性介入应该呈现的内容外，后记还应该呈现研究者查阅资料的过程与艰辛，这些宝贵的资料不仅是对读者的一个交代和尊重，也是对自己整个研究过程的梳理，是对读者的一个承诺，对自己的一次感动和认可，是一种永久的记忆。这种后记的方式应该与致谢一并附后，成为硕博学位论文的一种论文体例中的必要内容。两种过程介入的方式既可以单独应用在某一个单一研究方法的研究中，也可以应用在混合研究方法中。它使定量研究的数字充满温情，也使定性研究的文字更加令人信服，使研究浑然一体，更加丰盈。

3. 以电子方式呈现。从理论上讲，以注释的方式或后记的方式来呈现研究过程是合理的，尤其是对于著作而言，后记描述是容易的。论文的

研究过程呈现在现实中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面对越来越紧张的杂志版面，似乎很难做到将这些文字完整呈现。矛盾的解决可以借助电子网络平台。

研究者以注释方式加以简单说明，可以推荐读者到杂志网站平台去阅读详细的研究过程。在杂志的网站设置一个版块是不难实现的。这就需要杂志的征稿要求特别说明，需要作者另附研究过程的电子稿说明。如此，这种既要呈现研究过程，又不占用纸质杂志版面的矛盾可以得到顺利解决。

此外，国外研究论文参考文献通常要占用大量的篇幅，也是研究过程呈现的一种体现。未来的国内研究也必将越来越重视研究过程，必将使其大大方方地登向“前台”。

（刘晓红，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副教授，河南新乡 453007；李醒东，河南师范大学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河南新乡 453007）

（原文刊载于《中国教育学刊》2018年第11期）

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实证转向与现实反思

——基于2010—2019年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分析

蒋贵友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研究领域应该构建何种方法体系的论争贯穿于学科建设的始终，并在方法论层面徘徊于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近年来，以自然科学为范式原则的实证研究凭借精准、可重复以及可检验的特征优势，备受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推崇。相较于规范研究存在的科学性问题，实证研究结果开始成为评估教育理念与衡量教育决策的尺度。由于学科科学化建设以及“加强教育实证研究”宣言的倡导，实证研究范式被认为是推进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的必要途径。更为甚者，全面走向以实证主义为主体的教育研究的呼声甚嚣尘上。这一方法论转型大有成为教育学界集体共识的可能，同时加剧方法论层面的二元抑或多元冲突与对立，并引发学术共同体对不同方法论进行批判、辩护以及反思。作为教育学科的亚类，高等教育学历经了经验总结阶段、逻辑演绎阶段过渡到实证反思阶段，学科生发过程促使高等教育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体系同样随之变迁。但仔细思考，处于实证反思过程中的高等教育研究是否已然实现了方法转型？抑或是方法上的实证转向使高等教育研究更接近科学了么？实证研究是否在高教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凡此类问题的回答，仍需要回到对既有研究方法的使用趋势以及高等教育研究问题本身进行探究。

针对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学界已分别从权威学术期刊、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等资料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与分析。但从知识生产角度来看，由于学术期刊与人大复印资料等受限于学术旨趣与办刊特色而导致对象较为单一，而一门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则更具有内容的系统性、选题的前沿性以及方法的创新性。同时，当前关涉该类议题研究的分析仍然停留在历时性考察与趋势变化等内容，止步于对研究方法的描述统计归类，尚未从方法变迁层面进一步反映高等教育学科学化的方向与困境。这一研究进路无法回应当前弥散

于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方法之争，也未触及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证转向进行学理层面的反思，故而也不能真正回答高等教育学到底应归属于社会科学抑或是人文学科。因此，本研究尝试以2010—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研究对象，基于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探究高等教育研究在2010年代是否发生了实证转向，及在方法转型中高等教育研究面临的困境与迷思，以期对当前的争议与方法的误解进行澄清。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按照学科分类检索2010—2019年度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共检索出329篇相关论文。事实上，部分学位授予单位并未连续将博士论文上传，导致不同年度的论文分布并不均匀。因此，为更好反映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使用现状与趋势，仅选取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连续上传的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对所获得的博士论文进行整理归类，经过筛选后共获得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308篇。论文检索时间截止到2020年1月15日。

（二）论文分类与统计

由于博士论文内容通常涉及研究问题与方法的详细阐述，并论证问题与方法的逻辑关系，故此不能将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进行简单区隔，而是作为学位论文的子系统进行整体审视。为此，本研究不仅着眼于近十年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是否发生了实证转向，而且旨在进一步探究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之间的适切性。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的分类标准仍尚存争议。但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等二分法成为比较主流的划分依据。根据本研究所指向的研究问题，采取自然主义-诠释学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分类原则，将研究分为实证与规范两个类别。其中，规范研究主要涉及语义、文献、比较以及历史等具体方法；而实证研究则可分为

文的这一本质问题。正是对这一争议到目前为止并不存在唯一正解，由此促进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多元取向。就内涵而言，规范研究并不依赖事实数据的证实或证伪，而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知识演绎过程。因此，当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发生实证转向后，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加剧实证与规范之间的价值对立，而是应该反思如何基于理论思辨更好地促进教育实证研究的发展。不过就目前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趋势比较，无法探究不同实证取向的高等教育研究趋势情况，故此对博士论文中的不同实证方法进行精细化分类与统计。

（三）不同实证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

为准确把握实证转向下量化与质性研究的变化趋势，本研究对近十年实证类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的不同研究方法进行统计。根据统计，调查研究法、访谈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与文本分析法成为实证研究中的四种主要方法。（见图3）就总体而言，量化为主、质性为辅的研究方法格局已经形成。在实证类博士论文中，调查研究法使用占比最高的年份达89.7%，这一数据背后生动刻画了当前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对数据与测量的崇拜。与此同时，这一数据也表明研究者经过严格的预设与数据分析旨在揭示当前高等教育办学中的实践规律，而这种通过数据所推导的规律真的就比其他范式的研究取向更加科学么？但是，基于该趋势的反思并不是为了苛责量化研究的多寡，而是如何调节研究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如果将高等教育研究问题的多元取向化约为数据与技术一维，那么自然在研究中会遮蔽掉人的主体价值与文化所蕴含的复杂，而所有的问题在走向确证的过程中丧失掉本真意义。不过就目前而言，单一的实证研究方法正逐渐被多元实证方法协同的趋势所替代。譬如，访谈法、案例法以及文本分析法使用占比最高的年份已经分别达到76.7%、71.4%与42.9%。与此同时，调

查研究法与访谈分析法相结合的思路已在近5年的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中大量存在。这意味着，以演绎逻辑为主的量化研究与以归纳逻辑为主的质性研究相互嵌套，并在方法论层面将不可调和的价值对立转变为互补优势，正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实证转向的重要特征。

四、实证的迷思：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困境

当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由规范转向实证时，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整个学科朝着更加科学与多元的样态发展。但在实证趋势背后，证据至上与数据崇拜却似乎正成为一股风潮，部分实证研究跨越方法的限制边界简单将研究问题进行数据测量，这触发了学界对此的反思与批评。因此，本研究进一步通过对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中的实证研究进行分析，探讨实证研究所固有的局限及其研究边界到底是什么，研究问题与方法之间是否倒置了主客关系而陷入“统计主义”窠臼及当前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中的多元方法是机械拼接抑或有机协同等问题。通过此类问题的回应，探究实证趋势背后研究者所陷入的迷思与高等教育研究所面临的科学化困境。

（一）实证分析存在研究局限与边界

实证研究是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追逐科学化的产物，但这并不能掩盖实证本身所固有的局限。就量化研究而言，不断升级的数理工具以及愈发细分的研究领域，引领社会科学研究走向规范与精致。但在追逐客观与精确的过程中，研究者逐渐偏离了问题的真正焦点。似乎部分学者存有一种刻板印象，将实证研究简单等同或者化约为定量研究，通过调查、实验、准实验与大数据等方法揭示教育规律。这种狭义的观点在处理与解答研究议题时，极易走向对概念或变量间关系论证的思维窠臼。可以预见，这种无重点但又精确的数字化会引发学术界的科学危机，因为其忽略了教育实践更为深层而又复杂的本质并非完全可以由数字所替代这一前提。反观高等教育这一复杂系统，数理性的实证研究并非对所有议题奏效。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研究的不同尺度将导致量化分析产生大量畸变，以致实证结果在政策转化过程中失灵。在以高校教学评价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中，现有研究视野仍停滞于高校评教系统内部，简单测度学生评教的有效性，尚未厘清外部组织环境与评教实施之间的冲突与悖论，以致个体层面的行为改进与制度层面的管理优化未能在高校场域中奏效。从某种角度而言，高等教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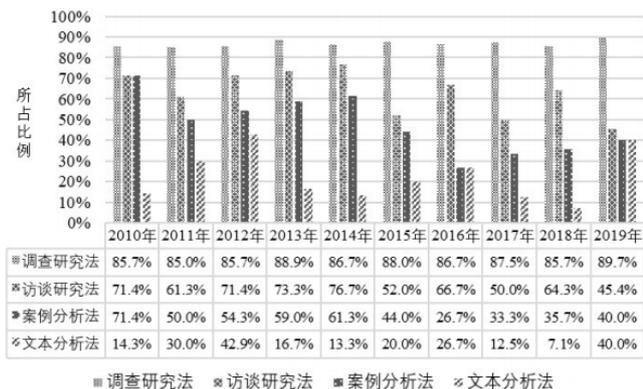


图3 四种实证方法使用的趋势情况

对于技术与统计的盲目崇拜正成为由学理迈向实践的桎梏。因此，正由于高等教育问题关注人的价值、学科复杂性以及发展的不确定性，决定了量化方法乃至实证方法并非高等教育研究的唯一。也正是由于不存在唯一科学的正解，那些贯穿于人类发展的教育问题才能在不同时代常议常新，以此回应社会当下对教育的困惑与追问。

（二）研究问题与方法的关系错位

对于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主客关系，这已然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从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而言，似乎正陷入一种“统计主义”窠臼中，简单通过对对象概念化与研究设计将现实问题转变为学术问题，并降维至可测量与统计的假设体系。这种实证取向下的经验研究将立体化的教育问题化约为几个解释变量间的一元或多元线性关系，这意味着研究者将研究问题削足适履地符合研究方法，由此导致部分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所选择的方法对所研究问题的解释能力大大降低。就量化研究而言，一个复杂的高等教育议题被简化为数字、变量以及假设，这便使证据与事实所装点的结论无限接近于想象中的客观，但却掩盖了教育所主张的生命价值以及研究推论中无处不体现着所谓的数据陷阱。在高校管理人员专业发展等实证类博士论文中，所涉及的数据调查并没有克服内生性问题，还导致了研究内容的表浅化与空心化，类似科学的数据模型却难以真正回应高校管理人员所面临的困境及其背后的深层影响机制。这类研究不仅暴露了研究者对于问题边界的模糊理解，而且还显现出博士论文中方法数据与研究问题之间难以对话的尴尬处境。在质性研究方面，诸多研究者倾向于将文本、访谈资料分析用于对量化研究结论的补充或升华，但却鲜少扎根于访谈数据资料中建构起理论的大厦。那么，无论是量化工具还是质性方法，绝不应该支配研究问题的取舍，或是驱动研究者陷入方法与问题相互独立与割裂的困境中，而是应该架构起学术理论与现实问题之间的桥梁。因此，立足、提出与解答研究问题，应该使研究者的理论积淀、价值关怀与精巧的研究设计协调统一，而技术方法不过是问题求证过程中的手段罢了。

（三）研究方法之间难以协调互动

由于高等教育议题的复杂性，单一的研究方法难以支撑系统性的博士论文选题，因此，研究者通常会基于研究问题选取多种适切的方法进行协同作

业。其中，以混合研究最为典型。它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弥补了各自在方法论层面的缺陷。具体而言，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量化研究与以解释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质性研究相互嵌套，满足了问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提升了研究的规范性与科学性。然而，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中的混合研究仅仅停留在量化与质性方法的机械结合层面，呈现为形式上的逻辑自洽。在高校管理人员专业发展研究中，研究者按照“理论-比较-现状-对策”的思路将研究主题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解读，但这种形式上的集成并没有转化为系统的方法合力，反而将研究内容肢解成毫无连贯的不同部分。同时，高等教育研究常常出现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辨彼此对立的场景，这种二元分野的现状导致了经验研究中的理论贫瘠与理论研究中的经验匮乏。就目前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而言，多数者将方法与理论当作研究的“拐杖”而非工具与资源，这自然又将导致实证经验研究变成另一场符应理论框架的技术游戏。学术研究绝非如此，高等教育研究也绝非是一门坐而论道的学问，唯有充分理解高等教育办学过程中的实践与经验，才能深刻体悟理论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并不被其所限制与圈定。因此，通过多元方法贯通高等教育问题背后的经验与实践，才能立足于经验把握问题的本质。

五、方法的祛魅：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现实反思

整个世界无疑正处于实证的时代，科学正取代艺术、人文与宗教，成为最主要的知识形态。处于实证转向过程中的高等教育研究，也正以积极的态度拥抱一切实证取向的方法与技术，但这股趋势似乎正转变为一种学术卡里斯玛。针对当前的方法与范式转型，学术共同体应该避免落入实证的迷思陷阱，告别对实证主义的技术盲从与数据崇拜，使多元化的研究取向重新返魅。

（一）推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共生发展

实证色彩已经成为西方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特征，这似乎对我国教育规范研究带来压倒性的威胁，迫使二者走向分野与对立。其实，无论实证研究还是规范研究，均不存在对他种方法的绝对优势，而是应该根据问题域选择恰当的方法与工具。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在教育科学领域走向互动与融合，能够发挥批判解释与规范描述功能的共生优势。一方面，教育实证研究的内容设计与假设不能

脱离理论思辨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教育规范研究的结果同样需要通过实证手段加以检验，以此修正或缩小思辨结论与现实的差距。然而，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证热潮早已触发学科困境，当思辨研究的生存空间正逐渐缩小的同时，实证研究也随即陷入了质量危机。那么，这一教训正对国内高等教育领域的方法崇拜发出警醒，使学界不得不重新思考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不过就研究议题而言，研究者应该牢牢把握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方法边界与适用范围，不可否认教育大数据研究与教育循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规律性，并对未来教育可能呈现的形态、发生结果与发展去向提供了预测。但是除此之外，高等教育中的价值、文化、制度取向以及对人才培养的反思，以量化研究为主的实证科学恐怕无法提供一条可待确证的解答路径，只能留待规范研究在价值层面的审思与哲学思辨。这也充分说明了唯有了解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特殊优势，才能更好地促进二者的融合与共生，进而提升高等教育研究质量的整体发展，而绝非倡导一种霸权式的话语体系，刻意造成二者在方法层面的分野。

（二）厘清研究问题与方法的主客关系

由于学科的范式转型，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选题同样从宏观分析走向中观与微观层面。对于高等教育学博士生而言，贫瘠的理论素养与问题意识迫使研究者常常将方法与工具悬置于研究问题之上，以定势化的测量思维与技术观念论证研究问题。鉴于此，所谓的计量分析、词频分析等方法充斥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这一研究进路将高等教育议题窄化为不同变量间的关系描述。但是研究问题内部的概念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为相互交错与耦合的复杂状态。这种境况倒逼研究者不断简化抑或是窄化教育问题，并程式化地进行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作为学科规训的结果，这是一场被工具与方法所支配与宰制的过程。真正的研究“技艺者”深感人文关怀与价值关切的重要性，绝非让研究问题削足适履地适应理论与工具的适用范围。那么，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首先应该重视研究选题与问题提出，依据研究问题的类型、属性与特征决定采用何种方法，使研究所指的事实、理论与方法形成对话与互动，并将经验数据上升到学术的理论品质。就此而言，研究问题的产生应回归到对高等教育发

展的价值关切，对问题的把握与分析则有赖于研究者的理论积淀与现实反思。因此，唯有厘清研究问题与方法之间的主客关系，才能将高等教育领域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系统中的公共议题，发挥高等教育学应有的想象力，走向一个更加多元与宽广的研究世界。

（三）促进多元化的实证方法协同融合

秉持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取向的方法与工具不胜枚举，但固有的方法偏见与崇拜致使研究者将实证方法直接等同或化约为量化统计。这一观点直接遮蔽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处理研究问题的共同性，进一步窄化了教育实证研究的内涵与范围。当面对复杂的高等教育议题时，单一的量化研究方法容易导致无意义的空心模型。况且，实证研究并非单指具体的操作技术与方法集合，更大意义层面还是一种精神、规范与价值观念。这便为混合研究的创立或不同实证方法的结合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其中，混合研究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共置于问题统一体中，它的整合品性放大了不可调和的两种方法的协同优势，既实现了研究精准性，又强化了对于本质问题的价值透视。两种方法的整合并不是访谈与调查的机械拼接，而是通过三角校正设计、嵌入式设计、解释式设计或探索式设计有机融合与科学设计的。除此之外，其他实证方法之间同样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且在探究教育问题本源与价值分析层面均具有独特意义。当不同研究方法共同进入研究场域时，都应按照系统序列原则针对教育问题展开有层次地分析，发挥不同实证方法的协同优势。无论是量化研究、质性研究还是混合研究，抑或是田野研究、问卷调查研究还是口述史研究，多元方法的协同都将置于研究者的理论与经验洞察之下，以此突破单一与封闭的实证研究方法体系所带来的窠臼与藩篱。在多元方法协同与宽广的研究视野下，高等教育研究使人的价值得以彰显，细节的力量更富活力，数据的分析更为理性克制，话语与案例分析的勾勒更加丰满与立体，而以高等教育学博士生为代表的年轻研究群体将开启一个更为多元与崭新的学术世界。

（蒋贵友，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6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9期）